

【论 文】

族群政治中的非抗争性利益表达

——基于2020年吉林省高考朝鲜语试卷阅卷改革事件的分析¹

金 婷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7级本科生)

摘要：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有关于“族群身份政治化”的讨论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领域最热烈的议题。讨论的关键在于马戎教授提出的，我国现有的民族政策与制度遵循着“政治化”的思路，在制度推进过程中又强化了各族干部群众的“民族意识”这一主张。基于此，如何通过政策改革推行族群身份“去政治化”，实现治理思路“文化化”的转变就显得尤为关键。其中，以“双语教育”为核心的政策变革是这一转变中最为重要的政策之一，由于“双语教育”改革过程中，公立教育体系中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的相对重要性往往被赋予重要的政治意涵，因此更易引发少数民族社区的抗争性行为。本文关注2020年吉林省高考在朝鲜语试卷阅卷上的改革在当地朝鲜族社区中引发的反应，发现利益相关的朝鲜族民众采用非抗争性利益表达与外部归因后的自我消化两种策略对改革结果进行反应与理解。这样一种温和的、非激进策略背后实际上是东北地区整体经济发展现状堪忧的背景下，朝鲜族精英个人的发展与自治地方的发展相剥离的倾向的体现。

关键词：双语教育 阅卷制度改革 利益表达 去政治化

一、引言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围绕“族群身份政治化”的讨论，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领域争论最热烈的议题。马戎教授指出，我国1949年以来的民族政策遵循的是“政治化”的思路。即首先通过民族识别，明确了各少数民族的边界，又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赋予了少数民族以独立的政治身份、政治权利与“自治地方”，而一系列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则赋予了少数民族以身份为基础的特殊权利，将民族身份与国家政治体制中的资源获取联系起来。这样的政策确实在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各族干部群众的‘族群意识’依然保持并在这些制度与政策的环境下有所加强，在一些族群的部分成员当中也出现了‘族群意识’向‘民族意识’转化的现象。”（马戎，2004）基于此，马戎教授提出“去政治化”的新思路，建立并巩固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民认同，消除少数民族身份的政治意涵，实现制度政策“文化化”的转向。这样一种“去政治化”的理论构建对我国一直以来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政策提出了批评，也在现有民族政策有效性受到质疑的背景之下，为国家民族工作提供了可能的发展路径。

其中，以“双语教育”为核心的政策变革，是少数民族政策中最关键的，也是最易引发争议的政策变革之一。相比于其他政治、经济领域，双语教育作为文化领域的政策，几乎与每个少数民族的利益切身相关，其影响力也相当持久与深远。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存续与发展的基础，而少数民族语言作为双语教育政策下相较于国家通用语言而言的弱势语言，其发展一直受到少数民族的强烈关注。双语教育是我国基于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教育程度、促进少数民族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等目的，于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项重要民族教育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通过《宪法》明确规定了尊重少数民族使用、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

¹ 本文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21届本科学位论文。

原则，并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明确规定，“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¹等内容，从法律上保障双语教育制度的推行。而在推进双语教育制度的过程中，随着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逐渐被强调，制度的整体侧重点也逐步向更加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与学习的模式进行改革。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要求，要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同时“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开设汉语文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加强学前双语教育”，将双语教学提前到了学前教育阶段。

教育是一个塑造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国家在推进双语教育过程中不断进行改革的实质，就是使其与国家整体的意识形态构建与民族意识构建保持一致，使之服务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追求。因此在制度上，民族教育政策从民族语言单语教育向双语教育模式发生了转变，进一步又从双语教育中以民族语言为主向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的模式转变。

尽管理论上发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目标并不矛盾，但在族群身份政治化的背景下，语言文字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公立教育体系中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的相对重要性，往往被赋予重要的政治意涵。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基础教育中的使用比例的改革措施，经常会被少数民族社区解读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侵害，并由此发动抗争性行为。举例来说，青海省政府2010年9月发布了《青海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针对民族教育问题，纲要提出“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为主”，“将国家通用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到2015年，小学实现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本民族语言文字为辅的双语教学”等内容。对此，当地群众认为该政策实质上体现了政府对藏语教学的弱化与轻视。2010年10月19日起，青海各藏族自治州部分中学生进行游行示威，对政府轻视藏语教育地位的态度表示抗议。

再比如，在教育制度改革过程中，教育部自2012年启动了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的统编工作，并自2017年起在全国小学、初中年级投入使用。基于国家的统一部署，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于2020年8月26日发布《全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实施方案》，制定了分三年实现推行统编教材的计划：第一步于2020年9月起在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开始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教材；第二步于2021年9月起在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统编《道德与法治》教材；第三步于2022年9月起在初中一年级使用统编《历史》教材。“统编”意味着以上三科教材均使用统一的国家通用语言版本，且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授课。这一政策引发了诸多争议与当地群众不满，被认为弱化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可能侵害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2020年8月末，内蒙古自治区内多地爆发了以学生与家长为主的抗议集会，他们反对改变现有教育模式，并通过引导舆论、罢课等方式进行抗议，以期政府能够撤回方案。

以上两个例子显示了“民族语言”在族群政治中特殊的敏感性。但是，并非所有类似的政策变革都引发了相关少数民族社区的激烈的抗争性行动。本文关注的经验现象是2020年吉林省高考在阅卷制度上发生的改革。其内容主要为朝鲜族考生以朝鲜语答题的试卷的阅卷人由原来的朝鲜族教师改为由汉族教师担任。这一措施使得朝鲜族中学学生的高考成绩与往年相比有了较为明显的下降。然而，与上文中描述的少数民族对双语教育制度改革的激烈反应不同的是，在几乎每一个与之相关的个体都受到直接的利益损害的情况下，本次阅卷制度改革却并未在吉林省朝鲜族聚居区引发任何群体性的集体行动。基于此，本文将从描述2020年吉林省高考阅卷制度改革入手，以改革直接引发的诸多社会反应为基础，分析双语教育体系改革下朝鲜族呈现出非抗争性利

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十七条。

益表达的应对策略的可能原因与背后的解释机制。

二、研究背景与问题

作为跨境民族，中国朝鲜族首先通过国籍的获得明确了身份的边界，又基于参与国家建成与发展的历史逐步构建了国家认同。而自治地方的形成一方面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利，促进了其文化发展，另一方面又因其过分强调少数民族的政治身份而受到争议。国家推行少数民族政策的初衷是为了维持国家稳定与促进文化多元发展二者并行，因此双语教育的改革实际上也是为了更好地遵循这一目的。

（一）朝鲜族与自治地方的形成

中国朝鲜族的形成首先是人口迁移的过程，即从朝鲜半岛移居至中国领域内并依据政府的政策获得中国国籍。更为关键的是，在这之后，朝鲜族人民通过参与“中国”这一国家建成的历史来获得对国家的认同，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步与原居住地实现文化、政治、经济等全方面的分割，真正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而自治地方依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推行而形成，其实质上赋予了朝鲜族以少数民族身份为依据的政治化的权力空间。

1、“中国朝鲜族”的形成

中国朝鲜族是由朝鲜半岛陆续迁入并定居在中国大地上，建国后正式确认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成员之一的跨境民族。明末清初已经有朝鲜族的祖先从朝鲜半岛迁入中国东北地区，并在现今的辽宁省定居。而出现大规模迁徙则是在清朝末年，即 19 世纪中叶。这首先与清政府统治东北的政策调整有关。在清军入关后，清政府于 1668 年起，将包括长白山、鸭绿江以北的大片区域划为“龙兴之地”，禁止异族迁入，同时也禁止异族移垦。到了 19 世纪中叶，政府开始局部开禁放垦，禁令逐渐松弛，地方逐渐默认朝鲜边民的迁入。之后清政府出于加强边防和增加财政收入等目的，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为朝鲜边民迁入中国提供了有利条件。包括 1881 年于珲春开设“招垦总局”，将图们江以北长 700 公里、宽 45 公里的龙峪地区划为朝鲜人专垦区；1883 年与朝鲜签订地方性通商章程《奉天与边民交易章程》，促进两国的交易往来；最终于 1885 年彻底废除了延续二百多年的封禁令。另一方面，朝鲜半岛复杂的政治环境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是朝鲜人民大量迁入中国东北地区的推力。鸦片战争后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朝鲜同样也遭到列强侵略，导致政局混乱。后又在 1860 年代连年发生了几场大的自然灾害，民众痛苦不堪，民不聊生。1910 年，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韩日合并条约》，朝鲜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实行的高压统治使得大量朝鲜人民移入中国东北各地。后在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后，为将东北建成其物资供应地，又以“集团开拓民”的名义强制朝鲜农民移民。自明朝末年开始出现移民起，受到清政府政策调整与朝鲜本土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移民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甚至一度成为浪潮。根据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当时我国朝鲜族人口为 112 万，是十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之一。

朝鲜族的国家认同一方面来自党和国家的良好政策，另一方面来源于共同参与国家建成的历史过程中。朝鲜人自朝鲜半岛迁移至中国大地后，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上带来了水稻技术，改变了东北地区单一的农业结构，推进了东北地区的农业复兴。二是在政治方面，在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斗争中，朝鲜族人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有许多共产主义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对抗日本的残暴侵略。在抗日战争时期，朝鲜族人民组织反日游击队，后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统计的数据，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有一万四千余名，其中朝鲜族占 70% 以上。在不断参与新中国建立与建设的过程中，朝鲜族逐步建立起了与主流社会的一致性，逐步加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个过程不仅是不断得到外部认可的过程，同时也是每个人从内部不断认可国家，形成“中国朝鲜族”

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中韩建交以后，朝鲜族基于天然的语言优势与亲缘优势获得了赴韩工作的机会，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认同并没有大范围减弱，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有所提升。由于赴韩务工者通常从事的都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并没有很好的职业发展前景，再加上出于经济压力通常居住在房租低、环境差的地方，这些成为刻板印象，使得朝鲜族无法融入当地韩国人的社交圈。在赴韩朝鲜族身上，结构同化会受到韩国主流文化的排斥，基于此许多朝鲜族也并不愿意向韩国文化靠拢，他们更多是希望从韩国赚取经济利益而使得家人在中国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在这种相互排斥的过程中，赴韩务工的朝鲜族的“局外人”观念也愈发明显。实际上，也正是因为与朝鲜半岛存在这样的亲缘纽带与经济关联，使得朝鲜族对于自己在国家中的政治站位更加敏感。

2、朝鲜族自治地方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朝鲜族的身份与地位问题被提上日程，在这一问题上，党和政府坚持允许“韩国人入籍”的立场，并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大会中明确了包括朝鲜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代表的参会地位，从政治上承认了朝鲜族作为中国国民的社会身份。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和中央于1952年正式成立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后又于1958年成立了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目前，我国有朝鲜族自治州和朝鲜族自治县各一个，还有43个朝鲜族乡镇，其中吉林省有11个¹，辽宁省有13个，黑龙江省有19个²。根据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资料显示，全国朝鲜族人口总计183万人，其中吉林省104万人、黑龙江省32.8万人、辽宁省24.1万人。而在吉林省2745.3万总人口中，朝鲜族占全省人口的3.8%，是吉林省占比最大的少数民族。

(二) 吉林省朝鲜族双语教育实施情况

吉林省作为朝鲜族聚居人数最多的省份，其双语教育实施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双语教育政策下教学体系设置的不同，使得朝鲜族在高考的科目等方面也与汉族有所不同。高考作为一个事关千万学子命运的考试，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公平，却在政策设置上存在对少数民族的“照顾”与优待。因此长期以来，无论是对朝鲜族高考成绩本身，还是对双语教育下少数民族优待政策的公平性始终存在争议。

1、双语教育下的教学体系设置

作为跨境民族，朝鲜族有着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双语教育制度的推行为朝鲜族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同时又为朝鲜族掌握汉语以适应主流社会提供了制度性基础。但由于朝鲜语教学和普及的情况随时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因此与国家政治生态有着紧密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和国家大力发展教育的背景下，朝鲜族聚居的地区开办了许多朝鲜族民族学校，用朝鲜语教授课程，在聚居区逐步普及了小学、初中教育。后随着我国政治斗争占据主要位置，朝鲜族中学的朝鲜语文课时被缩减，朝鲜语教学陷入混乱，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回到正轨。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1980年11月，州政府召开第二次朝鲜语文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朝鲜语是延边地区的第一通用语言。1982年，教育部颁布《全日制学校民族中小学汉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明确规定汉语文教学是第二语言教学，汉语文课是工具课。上述政策促进了民族学校的发展，但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却实际上使得朝鲜语在地方行政部门和公立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在某种意义上有违双语教育制度推行的初衷，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续政策的调整与改革设置了障碍。

1994年延边州颁布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教育条例》，规定自治州应参照国家教育部

¹ 《吉林省乡镇行政区划一览表截至2019年12月31日》，吉林省民政厅

² “民族分布”，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颁布的标准，结合朝鲜族教育的实际，确定囊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全阶段在内的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其他散杂地区的朝鲜族学校基本承袭了延边州的双语教学模式，在教材内容、课程设置、考试制度等各方面与延边州保持一致。根据现有文献统计，全国共有朝鲜族学校 140 多所，大部分分布在东北三省（权文天、李明姬，2021）。关于双语教育的教学体系设置，首先，在授课语言上，除汉语与外语（通常为英语或日语）以外的其他科目主要使用朝鲜语进行授课。教材则由延边教育出版社负责翻译与编写。翻译指的是对同地区其他汉族学校使用的教材（即人教版教材）进行翻译，主要科目包括除汉语文、外语之外的其他科目，民族学校统一使用翻译版教材。编写则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延边教育出版社作为“东北朝鲜文教材研究开发中心”，承担着朝鲜文教材的研究开发任务；二是延边教育出版社汉语编辑室负责编著汉语文课程需要的教材。自小学至高中的全阶段，朝鲜族学校一般统一使用该出版社出版的朝鲜语文和汉语文教材。

2、双语教育下的高考制度

1981 年，教育部规定“在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中，用本民族语文授课的学生，可以用本民族语文考卷，考本民族语文并加试汉语文”，这一政策为朝鲜族学校的高考模式提供了政策性依据，但也成为后来朝鲜族高考引发争议的原因。经过多年的调研与研制，2003 年开始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正式采用“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简称 MHK），并沿用至今。凡是用少数民族文字答卷的考生，必须参加 MHK 三级考试，无论最后是否取得三级证书，其成绩都将作为汉语文成绩计入高考分数中。MHK 三级考试包括听力理解、阅读理解和书面表达三个部分，各部分满分 100 分，共 300 分。考生的“民族汉考”（MHK）成绩将先折半换算为高考汉语文成绩，再按 50% 计入高考语文成绩。同样，朝鲜语文科目满分为 150 分，其成绩也将按 50% 计入高考语文成绩。其他科目都采用双语考卷的形式，即每人每科有一份汉语试卷和一份翻译版的朝鲜语试卷。在录取程序上，吉林省内采用统一试卷、统一划线录取的方法，朝鲜族考生的成绩与汉族学生成绩共同排序。

3、关于吉林省朝鲜语高考的争议

一直以来，朝鲜族都被认为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成果最为显著的地区之一，这源于朝鲜族一直以来重视教育的传统，并以近年来朝鲜族考生在高考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为证明。但是长期以来，朝鲜族的高考成绩在吉林省内部始终存在争议。这首先是因为，根据政策规定，朝鲜族考生在高考中以“朝鲜语文”与“MHK 三级”两门考试成绩折半相加来代替汉族考生“语文”一科的成绩。而“朝鲜语文”科目由朝鲜族教师出卷，再由朝鲜族教师进行阅卷，这呈现出一种实际上的民族垄断状态，因此其成绩被认为具有可操作空间，难以保证高考在阅卷上的公平性。另一方面，“MHK 三级”考试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考生统一的高考科目，各少数民族、各地区在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并不被考虑，因此这样的科目替代实际上难以保证高考在难度上的一致性。最后，我国实施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吉林省在 2020 年政策改革之前，统一给朝鲜族考生加十分，这被称为“照顾分”。基于以上政策设置，在统一划线、统一录取的大前提下，朝鲜族的高考成绩被认为存在“水分”，在吉林省内部乃至其他地区争议颇多。

（三）2020 年高考阅卷制度改革

2020 年高考阅卷制度改革指的是阅卷人的民族身份从以往的朝鲜族变为汉族，即从朝鲜族老师阅卷变为由会朝鲜语的汉族老师阅卷。重点在于在阅卷过程中严格要求“关键词”的审阅，要求严格依照参考答案的表述给分，甚至被要求将朝鲜语科目的平均分控制在 90 分左右。

这一改革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它的突发性和不可预知性。在高考前，老师们得到的消息是出卷难度会有所提高，因此在高考前他们不断向学生强调要稳住心态。而在高考成绩公布前，并没有任何书面文件或私下传言表示阅卷方面会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它通过改变以往的阅卷模式，打破了一段时间以来朝鲜族考生在高考中占据相对优势位置的局面。以吉林省 M 县的 N 中学为例，2020 届考生朝鲜语文单科最高分为 126 分，最

低分为 39 分，平均分为 86.0 分。与 2019 届朝鲜语文平均分 125.9 分，2018 届平均分 129.4 分，2017 届平均分 127.6 分相比有近 40 分的差距。另一方面，2017 届高考文科班本科率约为 94%，2020 届文科班本科率约为 79%，有明显下降。且在学校连续 4 年有清华、北大录取考生的情况下，本次 N 中学文科班成绩最好的同学最终被北京交通大学录取。以上数据显示，阅卷制度的改革上确实导致朝鲜族考生成绩整体上大幅下降，对他们产生了相当大的不利影响。

（四）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2020 年高考阅卷制度的改革，直接导致了使用朝鲜语参加高考的朝鲜族考生的高考成绩大幅下降，从而对他们所能考取的学校产生相当大的不利影响。从任何角度看，这一事件对当地朝鲜族社区带来的利益损害，都远高于本文引言中所列举的青海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推行的改革所造成的影响。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样一件存在大量利益受损者的事件，并未在当地引起类似前述的集体性抗议行动。朝鲜族学校和朝鲜族社区仅做出了若干非抗争性的利益表达行为，相对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本研究就从分析这一现象出发，试图解释非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背后的社会机制。

本研究聚焦于吉林省内部，选择的研究地点为朝鲜族聚居的社区——M 县。M 县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与朝鲜隔江相望。1956 年，M 县有朝鲜族人口 9819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36.3%，聚居形成一定规模。而根据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县户籍人口 82284 人，其中少数民族有 1.2 万人左右，占全县总人口 14.64%。至 2018 年，全县总人口为 80042 人，其中常住人口为 76862 人。研究场所集中在 M 县下辖的 L 镇，是 M 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教育设置上，L 镇有一所公立幼儿园，分为朝语班与汉语班；有三所公立小学，其中一所为朝鲜族小学；有两所公立中学，其中一所为朝鲜族中学。本研究聚焦于这所公立朝鲜族中学，即 N 中学。由于研究主要针对 2020 届高考阅卷制度改革，为了了解改革本身的情况以及引发的各方社会反应，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为该中学 2020 届高考的学生与科任教师。本研究主要运用访谈法，通过半结构访谈的形式对包括 2020 届朝鲜语文科任老师，2020 届文科班考生与理科班考生在内的 8 位对象进行了访谈。访谈对象基本情况如下表：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编号	性别	民族	身份
J	男	朝鲜族	N 中学 2020 届朝鲜语文科任老师
S	女	朝鲜族	N 中学朝鲜语文科任老师
Z	女	朝鲜族	N 中学日语科任老师
Y	女	朝鲜族	家长

表 1（续）

编号	性别	民族	身份	高考成绩
A	女	朝鲜族	2020 届文科班学生	599
B	女	朝鲜族	2020 届理科班学生	547
C	男	朝鲜族	2020 届文科班学生	473
D	女	汉族	2020 届文科班学生	551

三、社会反应：利益表达与自我消化

本文试图将阅卷制度改革引发的包括学校、教师、学生在内的各方反应总结为利益表达与自我消化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利益表达，人们或积极或消极地向外表达诉求，以期可以改变现有状况。另一方面，人们通过将其归因于外在于自我可控的因素，说服自己接受既有现实。

（一）非抗争性利益表达

首先，既然称为“利益表达”，意味着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人们都曾试图表达自己的诉求。但一方面这种表达呈现出身份上的特定性，即只有一部分人通过特定方式进行了表达；另一方面这种表达呈现出效果上的局限性，即表达往往并未获得有效反馈。其次，非抗争性意味着表达方式的非集体性与非激烈性。

1、特定身份之下的积极表达

积极表达的主要特征是诉求的向外输出，涉及与官方的对话，以学校、老师、学生三方当事人为代表，包括校长联名信、教师在自媒体发声、学生向教育局查分等行为。

高考成绩公布后，学校对外做出的最为官方的应对措施，是散杂地区（除延边、长春以外的其他地区）各校校长给省教育厅写了一封联名信以反映高考阅卷不公平的情况。但联名信并未获得反馈，也未对事件结果产生任何影响。

Q：“出分后学校方面没有表态吗？”

老师 J：“散杂地区的校长联名给教育厅写信反映这个事情，就是反映了高考阅卷不公平。”

Q：“后来怎么样了？”

老师 J：“后来没什么后续了，说是联名信，其实也没抱什么希望。分都出了，还能怎么样呢。”

同年十月，吉林省教育学院民族教育学院对全省 9 个地区的 11 所民族学校进行了民族教育教学工作专题调研活动。

老师 J：“十一月的时候，省教育厅派人来做了调研，说了说关于教材改革的事情，但吉林省迟迟不下指导性文件，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听说内蒙古那边是有什么平台可以反映问题，我们这边就没有。”

Q：“那对于这次高考的问题，教育厅有没有给出回应？”

老师 J：“开会汇报都是说好的方面，而且当时高考这个事儿也过去了两三个月了。”

根据官方说法，本次活动主要从民族学校总体情况、民族教育教研情况、教学及教师队伍建设情况、教材使用情况等方面进行调研，其实质是自下而上的现状汇报，而非自上而下的政策解释。

另一方面，以教师为代表的朝鲜族知识精英，特别是其中从事朝鲜语文教学的教师是事件发生后反应最为剧烈的群体。他们也自认为应该承担起与官方进行交涉与沟通的责任。然而作为知识精英，他们选择的方式是通过写文章等手段迂回表达不满与提出诉求，但却因审查严格而在效果上大打折扣。

Q：“学生和家长在事件发生后没有跟学校讨个说法之类的事情发生吗？”

老师 J：“学生和家长能做什么呢？是，他们不满也好，生气也好，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也就是我们作为老师看看能不能跟上面沟通，反映问题，我当时也因为这个事儿都快愁死了。”

也就知识人里那些有民族心的人会有想要做些什么的意识，很多教授他们会写写文章反映这个事情，但像报刊、媒体的审查都非常非常严格，没有办法，只能在自媒体上发表，那能有多大影响力呢。”

而学生作为此次事件的直接利益受损者，面对成绩的落差，他们的心情并非一味愤懑，而是非常复杂的。

Q：“看到分数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学生 A：“最开始当然是非常震惊，整个人都疯了。我以为只有我考得这么不好，吓坏了。后来我们班第二名问我考得怎么样，我才知道她也是这样，大家都考得不好。其实过了那个时间之后，更多的是无奈吧，毕竟我们也没什么办法不是吗。”

学生 C：“据说朝语批分的时候就下死命令了，平均分不能超过 90，结果出分一看确实是这样！居然有朝语考了 50 多分的，太扯了，简直五雷轰顶。”

Q：“所以出分后你们没能做什么？”

学生B：“我们挺多人去查分了，也是老师说的让我们去教育局查分，虽然查不出来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但就是表个态，让上面感受一下我们的不满。”

Q：“是你们组织起来一起去的吗？”

学生B：“不是，就是家长领我们去的，分别去的。”

高考成绩公布后，在老师的授意下，许多学生去教育局查分，重新核算分数。在老师和学生们看来这是为了“向上面表个态”。这是在高考成绩公布后学生群体做出的最具有集体意义和抗议性质的行动，但不具有组织性，也并不激进。

总的来说，在高考成绩公布后，学校、老师、学生层面各自进行了试图与官方进行对话的努力，然而这种努力与其说是为了实际地表达和实现诉求，更不如说是在表明不认可政策的态度，具有明显的象征性意义。

2、私人关系之上的消极表达

消极表达以对话与沟通为主，以知识精英通过私人关系与民族政治精英取得联系并进行交涉为代表。交涉结果得到的反馈是：政策推行显然具有其政治意义，有着更为宏大的国家层面的目标。首先从国家政策的整体取向及发展趋势出发，改革背后体现的是国家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目的。除此之外，对于接受双语教育的朝鲜族学生来说，进一步提高汉语能力对提高其整体素质有很大帮助，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现代社会。

老师S：“我们也不是不能理解，他们就是说要强化中华民族，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普及中华文化，这个目的是值得肯定的。但现在这么做，就搞得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教育跟双语教育产生矛盾了呀。”

老师J：“他们就是说，让学生好好学汉语能提升学生的能力，提高学生以后进入社会的竞争力，道理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想，如果高考在出题上越来越难是必然趋势的话，阅卷上能不能尽可能公平一点呢。”

但对于当事人而言，这两点理由实际上并不能解释改革高考阅卷方式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更没有对改革造成的后果进行任何弥补或后续的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知识精英作为代表通过私人关系与上级政治精英不断交涉的过程中，政治精英的民族身份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政治站位，他们始终是国家政策的发言人。

老师J：“民众是有许多抗议声，但就算是官方那边的从政的朝鲜族，也是站在中央政策的一边，就算是朝鲜族领导，他们做官了，那肯定还是要首先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建国初期的时候，很多朝鲜族都投身政界，所以当时很多政策都执行得特别好。像90年代的时候，咱们县里有个领导，就跟上边反映当时咱们县少数民族干部比例不符合政策要求，又跟老百姓们把这个政策讲明白，后来就有不少朝鲜族进单位里当干部。就是得有了解政策的人，他们去跟上边领导沟通，跟百姓们把政策讲明白，这就是个良性循环，自治地方也能发展得越来越好，能保障朝鲜族的利益。不像现在，年轻人都从商，考虑物质上的东西更多，也不愿意回小地方做事。”

可以明确的是，这种以知识分子为代表，通过私人关系与政治精英取得联系的结果，是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次事件达成了服从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共识。在双方沟通的过程中，朝鲜族政治精英坚定的政治站位使得他们作为事件发生后“下达”的关键，对于防止事件变质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

3、个人选择之中的趋利避害

个人选择上的趋利避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朝鲜族学校生源的缩减；二是考生们在对未来的职业与人生规划中存在的更加现实性的选择倾向。

本次阅卷制度改革发生后，M县的朝鲜族学校招生生源有所缩减，但与往年相比并不是特别

突出和明显。2021 级小学一年级入学招生共 26 人，初中一年级共 35 人，与上一级相比分别减少 4 人、5 人。2020 年秋季学期从朝鲜族学校转学至外地汉族学校的有 3 位同学，分别为二、三年级。尽管并不必然与 2020 年高考情况有关系，但生源缩减的趋势有所显现。

老师 J：“多无奈啊，连朝鲜族学校的老师也送自己的孩子去汉族学校念书，咱们学校现在年轻老师的孩子都是这样的。郑老师他们家孩子就送去实验小学了。”

Q：“为什么不送孩子去朝鲜族学校呢？”

老师 Z：“我想让我家孩子最起码通一门语言。说实话咱朝鲜族去社会上，心里面想的挺好的，但是话总是跟不上趟儿。学到最后，朝语说不好，汉语也说不好。而且我希望的是孩子在人多的地方长大。也能知道怎么处事。现在我儿子他们班一共有 55 个人，他们年级一共 4 个班，比朝鲜族学校学生多多了。”

家长 Y：“我们小时候读的是朝鲜族学校，那个时候汉语教得更不好，长大了就知道学的那些汉语是很不够用的。所以说想让孩子以后发展得更好，还是得让他好好学汉语，朝鲜族学校出来的汉语还是不行的。高考占不占优势那都是一时的，把汉语扎实学好才是最关键的。”

另一方面，对于学生们来说，此次突发的阅卷改革似乎成为了一种印证：过去人们对于朝鲜族在高考上的优势总有一天会消失的猜测是正确的，阅卷严、出卷难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朝鲜语学习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当传承民族语言、发扬民族文化这样宏大的目标在与个人发展产生矛盾时，就只能也必然让位于现实的需要。

Q：“你们觉得这次改革这样的情况会变成一种趋势吗？”

学生 B：“不知道，有说法说明年朝鲜语文也会压分，但应该不会那么严重。但是朝鲜族的高考肯定不会再那么风光了。”

Q：“以后会考虑回家或者回省里工作吗？毕竟在吉林的话，以后孩子也能有学朝鲜语的机会。”

学生 B：“我不太想回来了，吉林发展得也不是很好。而且这样压分，以后谁还会学朝鲜语呀，本来人家学一门语言的时间，我们学两门就很难了，再这样也没有必要让孩子学了吧。”

学生 C：“都想往更好的地方跑，谁想回来啊。朝语嘛，可以在家里教，能听懂就行呗。学不会就算了，汉语说得好更重要吧。”

无论是生源的缩减还是考生们呈现出的在个人选择上的现实性，甚至是“朝鲜族学校以后就不学朝鲜语了”这样的传言大扩散，实际上都是本次阅卷改革事件给人们的观念和心态带来的影响的一个部分，也是个人层面进行利益选择的体现。

（二）外部归因后的自我消化

另一方面，在既定现实面前，人们最终选择接受并尝试适应新的节奏。而外部归因并不是将改革视为单纯的国家政策的推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背后推动的力量进行弱化，以减轻政策本身带来的压力，更好地说服自己接受现实。

1、学校：反思学生素质

学校对内并未能够采取安抚性的措施以稳定学生情绪。在以往与隔壁汉族中学相比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时，在一定程度上将本届高考成绩降低的原因归结于学生素质低。

学生 A：“我觉得学生本身才是最惨的。如果按往年那样的话，我们学校今年的成绩也不会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我们考成这样，实验中学（隔壁汉族学校）又出了一个清华，学校可能面子上也挂不住，他们会觉得是我们没考好，明明我们才是受害者。”

Q：“那你是觉得学校那边态度不太好是吗？”

学生 A：“对，他们会觉得是我们没考好。其实也不是说学校说我们了或者怎么样，但就是能感觉到那个氛围，挺让人难受的。”

体制改革确实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本届学生整体素质较低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样的思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校的压力，也是学校在 2020 届高三已经成为定局的情况下，想要尽可能不影响 2021 届高考生的心态和斗志，尽量减小改革带来的后续影响的考虑。

2、老师：适应新形势

本次阅卷改革的突发性，使得朝鲜族特别是其中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知识精英在面对朝鲜族文化传承等问题上，变得更加消极与悲观。

老师 J：“我一直是反对考民族汉考的，像一些有见识、有魄力的校长也会安排自己学校学习跟汉族一样的语文教材，学多少算多少。但以后教材改成统编教材了，政策现在是说只要求历史和政治用汉语授课，但是那怎么可能只有地理用朝鲜语教学呢？以后慢慢肯定都要统一用汉语的，朝鲜语文以后就成了边缘学科了。

一直以来，朝鲜语课程都是学生们学习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途径。所以才说这次高考这件事打击了学生学朝鲜语的积极性，如果以后课时也缩减了，朝鲜语文就越来越边缘化了，那民族教育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方面是尽可能再跟上边反映看能不能争取，另一方面，既然已经成了既成事实，那在形势变化下，我们也得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教员提高自己的素质，适应新高考。”

朝鲜族知识精英有着更强的传承民族文化的意识和使命感，因此也是本次改革发生后受到心理挫折最严重的一批人。而强化汉语的学习必然导致朝鲜语学习的弱势，这本来就是双语教育中难以平衡的关键问题，在近近年来双语教育的相关改革中也有所体现。因此与其说是这次改革导致了朝鲜语文学科的弱化，不如说这样的政策倾向一直是存在的，未来也可能持续下去。

3、学生：“命不好、赶上了”

在高考问题上，首先，朝鲜族作为少数民族在 2020 年以前根据吉林省的相关文件享受 10 分高考加分的优待。另一方面，朝鲜族的汉语水平相较于其他少数民族而言普遍更好，因此在同样以“民族汉考”（MHK）作为替代科目时，成绩普遍更高。最后，由于朝鲜族考生使用朝鲜语答卷，因此在 2020 年以前阅卷人同样为朝鲜族。上述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群体的受教育权利，促进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但高考统一划线的制度背景下，公平问题就成为朝鲜族考生与汉族考生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因此对于此次高考改革制度，大多数学生将其原因归结于一直以来存在于吉林省内部的朝鲜族与汉族之间因高考加分政策和统一划线而产生的矛盾。

学生 A：“从六、七年前朝鲜族不是一直都考得特别好嘛，状元什么的都是朝鲜族，汉族就一直往上告，终于在我们这一年实现了。”

Q：“那你有想过朝鲜族也往上反映，往上告吗？”

学生 A：“我都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就觉得国家的政策嘛，必须接受。而且成绩都出来了，告不告的成绩也改不了了。”

学生 B：“其实如果说凭我自己的感觉的话，我觉得国家这样的政策还是情有可原的吧。虽然说少数民族地区可能教育水平、教育资源都跟不上，但教出来的孩子就是比汉族学生要差的，这是不可否认的。”

Q：“所以你觉得它公平吗？”

学生 B：“我不觉得它公平，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呢？……只是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也只能理解它。”

正因此，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朝鲜族在高考中占优势的局面早晚有一天会改变。比起反对政策本身，学生们的不满更多集中于改革的突发性与不可预知性。事前没有任何通知也没有任何风声，使得他们直到查分时才意识到事件已经发生。在访谈过程中，几乎每个人都提到“命不好”、“赶上了”，以这种带有命定论性质的归因说服自己接受既定事实。

Q：“你们对这件事情有所预料吗？”

学生 C：“其实一直都有这种说法，说考试题会出得很难，说会压分，年年都这么说，但前几年一直考得很好。所以只能说是我们命不好吧，正好赶上了。”

学生 A：“我还跟我妈说，如果早生我一年，就不会这么倒霉了。”

Q：“如果这件事提前有通知，比如书面的文件啊之类的，你们会更容易接受这件事吗？”

学生 A：“当然，如果考前提前告诉我们，我们在备考的时候也能更有针对性，不会那么松懈。而且就算最后结果还是一样，也能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而不是到了查成绩那天，满怀信心地查成绩，然后当头一棒。”

总的来说，通过非抗争性行为进行利益表达，和基于外部归因而进行自我消化，最终呈现出的，就是这场改革的利益相关者们在改革发生后并未采取激烈的、集体性的行动来试图引发政治性质的抗议活动，而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相对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其背后的原因与社会机制的分析需要着眼于更为宏观的社会背景与所处地区的整体状况进行考察。

四、族群身份“去政治化”的社会条件

在东北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现状堪忧的背景下，朝鲜族的精英与东北其他地区的人们同样具有较之以往更为广阔的流动空间和追求更好物质生活条件的愿望。这样的向外流动决定了少数民族精英走出自治地方、融入现代主流社会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因此朝鲜语作为一门工具性语言的意义逐渐凸显。个人的发展空间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自治地方，这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的是一种族群身份“去政治化”的倾向。

（一）地区的发展情况：东北的人口问题

新中国成立伊始，东北地区作为全国最主要的工业基地，为我国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这期间，东北一直是人口净迁入地区。改革开放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遭遇转型困境，逐渐与东南沿海等其他地区拉开差距，人口问题逐渐凸显。

关于东北人口问题，已有研究首先从分析其形成原因出发，认为问题的症结首先在于东北生育水平较低。自 1980 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东北作为全国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同时也是国有企事业单位众多的地区，政策执行力度远远大于同时期其他地区，取得成果也更为显著（李若建，2016）。而朝鲜族大多聚居于东北三省，其人口增长的整体趋势与东北大体上保持一致。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其人口发展模式在社会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就已经转向人口负增长。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延边地区已经形成“一胎生育成为习惯，多胎生育行为彻底消失，正常政策生育空间内的二胎生育现象也变得微乎其微”的局面（朴美兰，2010）。人口增长放缓带来的后果是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短缺，这是东北经济疲软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东北人口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东北作为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崛起的重工业地区，造就了大量资源型城市。“20 世纪 90 年代，在国企改革与资源枯竭双重影响下，东北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失业人群离开东北到其他地区谋生，是东北劳动力外流的重要原因”（李若建，2016）。大量朝鲜族也面临失业的困境。与之相对应，随着 20 世纪末韩国在签证政策上的逐步放开，朝鲜族依靠其语言优势获得了赴韩打工的机遇，获得了向外流动就业的特殊机会，而汇率差异带来的高收入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使跨国流动成为朝鲜族中的一种潮流，实际上朝鲜族劳动力的流失同样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人口外流呈现出人才流失严重、数量与素质双重外流、中小城镇对人口集聚能力明显偏弱等特征，因此其真正的问题在于人口质量与结构（戚伟，刘盛和，金凤君，2017）。针对东北地区经济下滑的情况，国家自 2003 年起规划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但即便是现在，东北地区的发展形势仍然非常严峻。有学者指出体制机制惯性、经济发展模式惯性、社会文化惯性等方面体现出的路径依赖，是制约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症结，只有通过提升

创新能力，使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动力，才能打破现有僵局，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金凤君等，2016）。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东北三省实现GDP分别为辽宁省24909.5亿元，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15位；黑龙江为13612.7亿元，排名全国第24位；吉林省为11726.8亿元，排名全国第26位。突破现有困境，从实质上提升创新能力是个漫长的过程，当下东北发展仍处在瓶颈期。经济发展低迷导致收入水平低，使得东北地区人才吸引力不足。根据2020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东北区域经济体本科毕业生实际在前四国所占比例为10.5%，而在本地区就业的毕业生所占比例仅为4.0%¹。人才缺失又将进一步制约东北经济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在人才外流严重、东北经济低迷、发展前景堪忧的背景下，作为主要聚居于东北三省的少数民族，朝鲜族人口情况同样呈现出与之相类似的趋势。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2018年末户籍总人口为208.6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48万人；其中朝鲜族人口74.92万人，占比为35.90%²。2019年末户籍总人口为207.2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46万人；其中朝鲜族人口为74.21万人，占比35.82%³。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延边州少数民族比例为39.3%，第六次人口普查时降至35.45%。人才外流同样发生在朝鲜族内部，新一代民族精英是向外流动的。

（二）个人的价值排序：功利性的语言学习

精英向外流动的趋向在访谈过程中也有所体现。关于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与人生规划，几乎所有学生都表示不会考虑回家乡M县工作。影响其意愿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经济与资源两方面。经济发展上，县城经济体量小带来就业机会少，薪资待遇相对较差，职业选择面窄等问题。再加上还存在着交通环境仍然较为恶劣，教育与学习资源不足，文娱活动单一化等导致生活上不便利的因素。这些因素实际上是M县作为一个小县城与国内其他发展相对较差的地方所具有的共通特性。作为自治地方，聚居区的民族环境与更为平等的民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形成吸引力，但力度非常小。也就是说，即便是从小居住在聚居区，且接受民族教育的学生，在其职业与人生规划中，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民族整体的发展即便是作为影响因素，其影响力度也是相对较弱的。

访谈中，教授朝鲜语科目的老师提到，在学生培养的全过程中，朝鲜语文是最有可能培养学生们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赋予其继承与发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使命感的科目。然而语言文字本身具有工具性与文化性两种涵义，在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条件下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偏向。在现今的双语教育体制下，朝鲜语文作为高考的一项科目与高考成绩挂钩，这使其不可避免地带有功利性的因素。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朝鲜语文的学习可以使他们在高考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能够在未来作为一门语言优势有助于其职业发展。因此高考成绩公布后，当阅卷制度改革已经造成结果，成为既成事实无法改变时，他们并没有有意识地把这件事与民族的未来联系起来。同样，年轻的朝鲜族家长选择送孩子读汉族学校的背后，实际上也是考虑到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在未来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年轻家长而言，特别是对于受民族教育长大的新一代家长，民族教育体制下汉语学习的不足使他们在融入现代汉族主流社会时遇到或多或少的阻碍，这种阻碍影响了他们对于下一代的教育规划。也就是说，对于成长于聚居区的人们而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得民族语言的工具性意义不断加强，文化性意义随之减弱。

（三）“去政治化”的倾向：“自治”意义的弱化

结合上文中提到的东北人才外流的大背景来说，对于生活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人们来说，追求更好的生活与发展机会是一种趋利本能，在这样的本能驱使下，广阔的流动空间为朝鲜

¹ 麦可思研究院，《2020年中国本科/高职高专生就业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

²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³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族带来的是更需要融入现代社会的焦虑。而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掌握汉语是朝鲜族融入现代主流社会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人们将学习汉语看作是谋求未来发展的一项必要条件，同时人们又希望融入现代社会，因此在改革发生后，无论是通过私人关系还是官方渠道与上级进行交涉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汉语能力进而提高学生的竞争力”这种说法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得到人们的认可。

在精英阶层不断外流出自治地方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现代化进程的确构成了一定的矛盾。在自治地方的人才吸引力不断减弱的背景下，人们将融入主流社会视为更优先的目标，而将民族文化遗产排在其后，是在此背景下的无奈之举。然而这样的发展趋势实际上意味着于个人而言，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自治地方的“自治”意义将不断减弱，人们不完全依赖于自治地方的发展而谋求个人的发展，同样也不将在民族制度下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视为民族发展的唯一可能性。

五、总结

通常我们会认为，有本民族语言、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更容易在民族利益受损时采取政治化的形式与手段寻求解决。而朝鲜族作为具有以上特点的典型民族，在面临本次高考阅卷制度改革时并未采取激烈的、集体性的对抗形式，而是通过运用私人关系进行交涉、在个人选择上趋利避害等非抗争性的手段表达诉求。实际上，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问题是否政治化是由这一民族的历史——如何定义自己在国家体制中的位置——以及其所聚居的地区的经济政治结构等多项因素综合决定的。

通过对经验材料的梳理与分析不难发现，整个事件的逻辑首先在于，朝鲜族考生本身认可往届高考的优异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政治化”治理思路下产生的优势性结果。因此，当突发性的改革使他们失去了这一优势，他们所关注的重点更多聚焦于改革的“突发性”而非改革带来的利益损失。对于这些学生们来说，他们的职业规划与人生志向实际上并不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特征，而是与东北整体发展情况等大的背景有着密切联系。这意味着在人口外流严重、传统民族聚居形态逐渐受到挑战的新形势下，呈现出一种个人的发展不必然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相关，民族的发展不必然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相关的倾向。例如各地方组织的朝鲜族同门会就是一种典型的脱离民族自治地方、而以民族身份为依据的民族纽带。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体现出，在以“去政治化”为目的的改革自上而下逐步推进的同时，少数民族内部事实上也出现了自下而上消解“政治化”的现象。

参考文献：

- [1]. 戴庆厦，董艳，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下)[J]，民族教育研究，1997 (01): 50-61.
- [2]. 冯乐安，东北人口的流动转变(1995-2005)——基于不同学历人口的比较[J].开发研究，2021 (01): 130-136.
- [3]. 金凤君，王姣娥，杨宇，马丽，齐元静，东北地区创新发展的突破路径与对策研究[J].地理科学，2016, 36 (09): 1285-1292.
- [4]. 姜玉，刘鸿雁，庄亚儿，东北地区流动人口特征研究[J]，人口学刊，2016, 38 (06): 37-45.
- [5]. 李瑞华，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与转型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J].民族教育研究，2020, 31(05): 132-138.
- [6]. 李若建，角动量效应：东北人口变动分析[J]，学术研究，2016 (08): 55-62+177+2.
- [7]. 罗妍，潘信林，仇森，发展与转变：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评估及展望[J]，中小学管理，2020 (11): 31-33.

- [8]. 马戎,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06): 122-133.
- [9]. 朴美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原因探析[J], 东疆学刊, 2010, 27 (01): 55-63.
- [10]. 戚伟, 刘盛和, 金凤君, 东北三省人口流失的测算及演化格局研究[J], 地理科学, 2017, 37(12): 1795-1804.
- [11]. 权文天, 李明姬, 中国朝鲜族教育资源建设现状调查研究[J], 中小学电教, 2021 (Z1): 4-6.
- [12]. 孙春日, 李秀玉, 中国朝鲜族“族群”边界的构建与多重认同[J], 广西民族研究, 2018 (02): 74-80.
- [13]. 孙璐璐, 朝鲜族的迁入和东北水田的开发[J], 新西部, 2020 (06): 101+78.
- [14]. 王丽华, 基于几起语言事件的语言政策研究[D]. 暨南大学, 2012.
- [15]. 俞永虎, 构建符合实际的双语课程体系和富有特色的双语教育模式——吉林省延边州朝鲜族双语教育发展60年[J], 中国民族教育, 2009 (10): 20-22.
- [16].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 2013年6月
- [17]. 张静, 《中国社会学四十年》, [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论 文】

印度的语言政策与族群关系¹

肖 宪, 毕媛媛²

摘要: 语言在民族身份认同中具有识别、构建和强化的作用, 对民族国家往往具有统一和分裂的双重作用。当代印度独特的语言问题和语言政策对其国内的族群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属印度时期, 英国殖民者力图通过语言霸权达到同化印度的目的, 但却催生了现代印度民族主义。印度独立后的国家语言规划面临极大的挑战; 建国初期推行的印地语国语化政策加剧了国内的民族冲突; 原殖民语言——英语地位的恢复起到了平衡内部族群冲突、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 “三语模式”的确立体现了国家语言政策对复杂民族关系的再一次妥协。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两股潮流的冲击下, 印度的语言政策和族群关系仍将面临严峻考验。

关键词: 印度; 语言政策; 国家认同; 族群关系

语言在民族身份认同中具有识别、构建和强化作用, 对民族国家具有统一和分裂双重作用。印度是全世界语言状况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在全国 13.8 亿人口中³, 有 6 个语族、22 种官方语言和数百种母语⁴。印度内政部 2001 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表明, 在印度, 超过 100 万人(作为母语)使用的语言有 30 种, 超过 1 万人(作为母语)使用的语言高达 122 多种, 其他种类的语言

¹ 本文刊载于《思想战线》2021年第2期, 第12-20页。

² 肖宪,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毕媛媛, 云南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助理研究员,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³ 根据联合国最新数据, 印度人口为 1381433578 人。详见“2020年印度人口”, <http://www.indiaonlinepages.com/population/india-current-population.html>, 2020年8月31日。

⁴ Mohanty A.K., “Languages, Inequality and Marginaliza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Double Divide in Indian Multilingu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5 (2010), pp.131~154.

和方言更是高达 1500 多种。印地语（Hindi，包括各种变体）的使用人数最多，约为 5.9 亿，占全国人口的 43.6%。¹孟加拉语（Bengali）8.3%、马拉地语（Marathi）6.9%、泰卢固语（Telugu）6.7%、泰米尔语（Tamil）5.7%、古吉拉特语（Gujarati）4.6%、乌尔都语（Urdu）4.2%、坎纳达语（Kannada）3.6%、奥迪亚语（Odia）3.1%、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2.9%、旁遮普语（Punjabi）2.7%、阿萨姆语（Assamese）1.3%、迈蒂利语（Maithili）1.1%，其他语种 5.6%。²

印度的语言带有强烈的民族和宗教色彩，因此该国的族群和宗教冲突往往也伴随着激烈的语言冲突。印度教徒占全印人口的 80%，是印度最主要的宗教；伊斯兰教是该国第二大宗教，穆斯林人口为 13%；该国还有锡克教徒和基督教徒，但人数不很多。旁遮普邦是锡克教徒最集中的地区，锡克教徒占当地人口的 60% 以上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被认为是“两个民族”；实行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其核心即是按照宗教，而不是按照语言或民族来划分，因而为印巴关系留下了无穷后患，也使克什米尔的归属悬而未决，造成印巴两国为争夺克什米尔一再兵戎相见。语言和宗教是印度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族群要素”，对印度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长期的、持续性的影响。直至今日，语言和宗教矛盾在印度族群关系中仍然是潜在的爆炸性因素。

一、印度语言发展的历史脉络

印度语言发展经历了古代封建王朝时期、近代英国殖民时期和现代国家独立时期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对当代印度的语言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虽然印度是一个拥有璀璨历史文明的古老东方大国，但“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⁴在古代封建王朝期间，尽管印度经历了吠陀时期、孔雀王朝、笈多王朝等强大的封建王朝，但中央王朝对各个地方的控制却非常松散。王朝中央主要靠使用武力维持统治，很少派遣行政官员到各地推广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来强化管理。因此，封建王朝时期的印度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也没有形成通用的民族语言。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印度的语言大致可以分为北部的印欧语言，即印度-雅利安诸语⁵，和南部的达罗毗荼诸语（Dravidian family）。⁶大约在公元前 2 000 年，梵语由侵入印度的雅利安部落带到了印度，因此印度北部地区的多数语言都从梵语演变而来，包括印地语。根据学者论证，南部达罗毗荼语系不同于北方语系，而且泰米尔语在印度的历史要早于印地语。例如，约翰·马尔在《早期达罗毗荼人》一文中指出：“原始的达罗毗荼语是一种非印度-雅利安语言。”⁷尽管没有足够依据证明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前，达罗毗荼语曾经通行于印度全境，后者早于前者却是不争的事实。另根据学者论证，哈拉巴文化早于雅利安文化。印度学者 R.塔帕尔指出：

在哈拉巴遗址的骸骨遗物中，有南方古人、地中海人、阿尔卑斯人和蒙古人的证据。……

南方古人是基本因素，他们的语言属于南方语系；……地中海人一般认为与达罗毗荼人的文

¹ 此次人口普查列出了 48 种变体及其他。如果加上关系紧密的亲属语言乌尔都语的使用人数，或者加上其他同源语言的使用人数，则印地语的使用人数足以超过 50%。

² 周少青：《印度民族国家构建中应对复杂多样性的政治策略及其效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 年第 6 期。

³ 详见 2011 年印度人口普查。“印度的宗教人口”，India Guide: Population of India, Population by Religion in India, <http://www.indiaonlinepages.com>, 2020 年 6 月 5 日。

⁴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47 页。

⁵ 亦称印度语支，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通行于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⁶ 达罗毗荼语系又译德拉威语系，主要分布在印度南部和中部，其次在斯里兰卡北部和巴基斯坦等地。主要是南印度的语言，包括泰卢固语、泰米尔语、卡纳达语和马拉雅拉姆语，占全印操本族语人数的 22%。

⁷ [澳]A. L. 巴沙姆：《印度文化史》，闵光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41 页。

化相联系。……最后到来的是通常称之为雅利安人的民族,雅利安事实上是一种语言的名称,表明源于印-欧的一个语言群,并不是一个人种的称谓。¹

追根溯源,印度南方反对印地语的统治地位与历史不无关联。泰米尔人认为印地语的历史不如泰米尔语的历史悠久,而且缺少泰米尔语所拥有的丰富的文学传统。

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人侵入印度,在信德、木尔坦地区维持了达3个世纪之久的统治,阿拉伯语也因此传入印度。在阿拉伯人到来之前,信德各地人民使用不同的地方语言,如印地语、信德语、马尔加拉语及莫克兰语等。阿拉伯人统治时期,人们普遍使用信德语和阿拉伯语。同时,信德语也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语词汇,并采用了阿拉伯语书写体。²后来,波斯-突厥人占领了北印度,在印度统治了500多年。中亚穆斯林将波斯语带到印度,并逐渐取代梵文,成为北印度各地的官方语言。波斯语的使用和波斯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当地语言的发展。乌尔都语起源于11~12世纪的印度北部,是从克利方言(又被称为德里方言)发展而来的。乌尔都语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正处于德里苏丹国等伊斯兰王朝的鼎盛时期,在伊斯兰文明的影响下,乌尔都语吸收了很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发音和词汇。因此,该语言具有伊斯兰文化的许多特征。³

古老的村社制度使得各个地区之间的交往很少,因此,长期以来,南亚次大陆上小国众多、土邦林立,再加上不断有外族入侵、民族迁徙以及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印度在历史上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和共同的文化,也没有形成古代中国那种以中原文化和汉语为核心的主体文化,其“原初的和次第侵入次大陆的各种文明都未能将侵入的异族文明有效整合、融合或同化”⁴。突出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以及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权力进行干预,南亚次大陆上各族裔形成共同交际语言的过程极为缓慢。虽然梵语曾经在南亚次大陆大部分地区使用,但历史上的梵语更多地是一种文学和宗教语言,从未成为各族群之间的交流语言。在莫卧儿王朝统治期间,突厥-波斯语被用作官方语言,广泛应用于政府、法律和商业等各个领域,但也从未取代这些领域中的其他语言。实际上,在英国取得对南亚次大陆的殖民统治之前,印度一直没有出现过大多数居民通晓的共同交际语言。

二、殖民化对印度语言发展的影响

英国在印度的经营长达300多年,直接的殖民统治也长达190多年;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的语言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英语的全面传播。英语在印度的早期传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614年,是西方传教士在印活动阶段。在此期间,一些英国传教士为了让印度人理解和接受基督教,开办了一些初级英语学校,少数印度人开始学习英语;第二阶段是在18世纪中,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活动的扩大,英语教育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印度人通过接受英语教育,成为掌握英语和地方语言的双语人才,为殖民当局服务;第三阶段始于1757年印度在普拉西战役中失败,开始沦为英国殖民地,英语作为“征服者的语言”开始在印度扎根,在行政、商业和文化中的地位日趋重要。

英国殖民早期,在语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殖民者内部曾有过所谓“东方主义派”和“西方主义派”之争。两派的分歧主要在于,是用印度的传统文化为基础,还是以西方的文化和教育体系为基础;教育的媒介是采用印度本土语言,还是用英语。早期东印度公司主要从事经济活动,当时印度处于莫卧儿王朝统治之下,主要使用梵语和宫廷波斯语。对于早期殖民者们来说,学习和掌握当地语言,对于巩固和加强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是非常重要的。东方主义派认为,英国应该

¹ [印]R. 塔帕尔著:《印度古代文明》,林太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² 张玉兰:《阿拉伯人征服信德对印度社会的影响》,《南亚研究》1987年第4期。

³ [法]沙赫泽曼·哈克:《乌尔都语在印度将何去何从》,袁雨航译,《世界知识》2019年第23期。

⁴ 周少青:《印度民族国家构建中应对复杂多样性的政治策略及其效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用“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融入当地人生活”的方法来统治印度¹。代表人物普林赛普提出，英印殖民政府应当支持印度学术研究，应使用印度当地的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和梵语）来逐步向印度民众介绍西方的文化和文明，加强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交流。²东印度公司曾要求任职于政府部门的职员必须懂当地的印度语言。

但随着英国统治的稳固，西方主义派逐渐占了上风。1834年7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麦考利被派往印度，担任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麦考利被认为是著名的“西化派”代表，在其《印度教育备忘录》（Minute on Indian Education）中，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详细论证了在印度推行英语教育的必要性。³他们认为，对于印度社会中“普遍的愚钝与无知，只有教育，首先是英语教育，方可消除这些现象”。⁴1835年3月7日，总督本廷克颁布了《印度教育决议案》，自此，印度的英语教学及近代教育迅速发展。⁵殖民当局通过自上而下的渗透，将英语作为媒介，开始对印度采取输出西方制度和文化的统治方式，英语逐渐成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出版印刷的语言，获得超越其他语言的核心地位。1837年，英语正式取代波斯语成为官方语言，西方文化对印度的输入、渗透和影响日益加深，使印度传统文化也发生了变异，在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英-印复合型文化”。⁶

殖民时期英语在印度的传播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英语教育培养了大批效忠于殖民政府的“代理人”，直接或间接地为英国殖民统治服务。而另一方面，英语教育带来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也孕育了一批印度精英群体的民族意识，也孕育了他们摆脱殖民统治的愿望。无论是印度近代民族复兴启蒙者拉姆·莫汉·罗易，还是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圣雄”甘地、泰戈尔和尼赫鲁等人，都是通过英语教育接触了民族主义思想，同时英语也是他们组织和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工具。印度学者克里希那斯瓦米就指出：“印度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受到启蒙的本地人利用英国教育和英语反对英国统治，正是英语教育最终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⁷

随着反殖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和组织化，语言问题再度浮出水面。由于殖民当局同意低级行政机构使用地区语言，支持中级行政机构使用乌尔都语、英语和印地语。乌尔都语受到如此礼遇，让受过教育的印地语使用者感觉受到了双重歧视。1893年，学生们成立了促进印地语的协会；1910年，印地语协会（Hindi Sahitya Sammelan）成立。不过，这一运动旨在捍卫印地语，并未涉及采用哪种语言作为全印交际用语。20世纪初，印地语逐渐成为印度民族主义的象征。不过印地语倡导者推广的是一种经过改良的印地语，剔除了其中的波斯-阿拉伯语词汇，增加了取自梵语的新词汇；书写也不使用波斯（阿拉伯）字母，而是“天城体”。⁸“圣雄”甘地认为，英语是推行印度国语的阻碍，摒弃英语具有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象征意义。但他在印地语问题上比较慎重，更倾向于用印度斯坦语作为新国语。印度斯坦语是一种通俗的交际语，讲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人都会使用这种语言，因而也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的语言。它被视为非文学的“低级”和“通俗”语言，极富平民主义色彩，对消除不同族群的语言差异和阶级差异也具有积极意义。

¹ Pennycook, Alastair, *English and the Discourses of Coloni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78.

² H.T. Prinsep, “Note on Vernacular Education, 15th February 1835”, in H. Sharp (ed.), *Selections from Educational Records Part I, 1781-1839*,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20, pp.117~129.

³ T.B. Macaulay, “Minute on English Education, 2nd February 1835”, in H. Sharp (ed.), *Selections from Educational Records Part I, 1781-1839*,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20, pp.107~117.

⁴ [印]R.C.马宗达等：《高级印度史》（下册），张澍霖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79页。

⁵ William Bentinck, “Resolution, 7th March 1835”, in H. Sharp (ed.), *Selections from Educational Records Part I, 1781-1839*,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20, pp.130~131.

⁶ 刘长珍：《从单语主义到多语主义的转变——印度语言政策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35页。

⁷ 李红毅：《印度语言政策与语言民族间的冲突与争论》，《贵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⁸ 印度文字之一，成熟于7世纪，最早用于书写梵语，现也用于书写印地语等。

三、印度独立后的国家语言政策

语言的多样性丰富了印度人民的文化，但也成为印度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独立后的印地语国语化运动和按语言建邦运动都导致了地区动乱和族群冲突。围绕语言问题的冲突、对抗时有发生，对印度的族群关系和国家认同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印度的一些本土学者把语言矛盾称为印度必须面对的三大矛盾之一（种姓矛盾、宗教矛盾、语言矛盾）。

“国语”（national language）的概念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而形成的，它是“由历史形成或政府规定的一种标准语或全国通用的共同交际用语”，它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的、文化实体的语言”¹。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印地语正式成为印度的国语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在殖民统治者这个共同的敌人消失后，印度内部的民族、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却开始凸显，语言问题成为印度各种内部矛盾冲突的一个爆发点。在那些母语为非印地语的地区，许多人担心如果以印地语为国语，将会损害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在地方政治势力的操纵下，在泰米尔纳德邦等一些地区爆发了“反印地语运动”，这种情况不得不使当时的国大党领袖在语言问题上做出让步。1950年，印度的第一部宪法出台，该宪法关于语言问题的表述没有使用“国语”这样较为敏感的词语，而是用“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来确定印地语的地位，英语也同时被确定为官方语言（期限仅为15年），同时还列出了15种国家承认的邦级官方语言。

印度族群内部的第一个冲突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印地语是印度教徒的语言，而乌尔都语是穆斯林的语言。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仅为政治权力的分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同时也为提高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地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原属同一种语言，即属于印欧语系的印度斯坦语，乌尔都语是从印地语变体发展而来的。两者之间的语言差异在于，印地语主要是用梵文书写和借词；而乌尔都语主要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书写和借词。两种语言之间的争端主要归因于不同宗教的信仰和利益之争。这场冲突最终以原英属印度殖民地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而告终，印度斯坦语也因而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乌尔都语成为了巴基斯坦的国语，但印度境内仍有约5千万人讲乌尔都语。²

印度族群内部的第二个冲突是印地语族群和非印地语族群之间的冲突。独立后，印度政治家在官方语言问题上格外慎重。但1965年1月，一些族群为了抵制“印地语帝国主义”及“把南方人降为二等公民的阴谋”，在南部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先后有159人被警察开枪打死，数百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5人自焚。1965年2月，印度南部举行了包括6个邦在内的政治性总罢工；1967年，泰米尔族大学生提出了禁止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马德拉斯市放映印地语影片、关闭“印地语推广协会”、禁止该协会在泰米尔纳德邦领域内活动等要求，结果在马德拉斯又有78人被打死。1967年12月，印度南北各地因语言冲突共发生49次严重暴力行动，其中包括焚烧邮电大楼、火车等。³面对激烈的冲突，印度中央政府不得不作出妥协，在《官方语言法》（1963）第三条中规定：“联邦与印地语区各邦之间交流使用印地语，应将英语用于联邦与非印地语区各邦之间的交流。”进一步规定，“如果一个邦已将印地语作为其官方语言，而另一邦未将印地语作为其官方语言，则在用印地语进行此类交流时，应同时附上该印地语的英文译文。”⁴这意味着，印地语、英语和其他本土语言仍将继续共存，延续着它们并不稳定的平衡状态。

¹ 廖波：《世纪国语路：印度的国语问题》，《世界民族》2013年第1期。

² Gandhi, K.L., *The Problem of Official Language in India*, Delhi: Arya Book Depot, 1984, P.75.

³ 何俊芳：《国外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与民族关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⁴ 印度《官方语言法》（THE OFFICIAL LANGUAGES ACT, 1963），由印度共和国1963年议会通过，1967年进行修订。该法案第三条“英语作为联邦官方语言继续在国会中使用”于1965年1月26日生效。详见“Continua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for official purposes of the Union and for use in Parliament”，<https://rajbhasha.gov.in/en/official-languages-act-1963>，2020年10月5日。

独立后，全印度仍按原殖民时期划分为 29 个邦，这种划分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间存在的宗教、文化、经济和语言上的差别，实际上给地方民族主义的兴起带来了机会。20 世纪 50 年代，印度掀起了一股建立“语言邦”的浪潮。1952 年，印东南部爆发了安得拉运动（Andhra movement），要求以语言为依据建立独立的语言邦——安得拉邦，该邦领导人波蒂·斯里拉玛鲁在绝食抗议中丧生。虽然当时的领导人尼赫鲁对此十分警惕，认为按语言建邦“将会妨碍国家整合的过程，扰乱我们的行政、经济和财政结构，并在我们处在国家的初建时期就释放出扰乱与分裂的力量”。¹但在地方民族主义势力的巨大压力下，只得同意按照语言边界重新划邦。1952 年，第一个语言邦——“安得拉邦”得以建立；1956 年，印度国会通过“邦改组法”，将全国按语言分布重新划分为 6 个直辖区和 14 个邦；1960 年，孟买邦按语言重新划为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1966 年再次调整邦界，旁遮普邦重组为讲旁遮普语为主的旁遮普邦、讲印地语的哈里亚纳邦和昌迪加尔邦。印度东北部原有的阿萨姆邦，在语言划邦运动中先后分为阿萨姆邦、梅加拉亚邦、那加兰邦、米佐拉姆邦、曼尼普尔邦、特里普拉邦等。²按语言建立的邦出现在全印度各地，各个地方邦也明确规定了该邦使用的官方语言。这种按语言建立“语言邦”是印度独特的现象，也是印度语言民族主义的胜利，客观上使印度多官方语的状态逐渐被固化。

为了避免国家分裂和脱离中央政府，“邦改组法”规定重组必须遵循 4 个原则：第一，联邦政府不承认提出分裂要求的族群，将用武力对其进行镇压。根据这一原则，印度军队与民族分裂势力多次发生冲突，甚至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尤其是在克什米尔、阿萨姆、旁遮普和东北地区。第二，不容许以宗教作为邦界划分的要求。这主要是接受了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出去的教训，随后便影响了锡克教徒提出的建立以锡克教徒为主的政治实体的要求。第三，联邦政府只对具有多数人支持的政治要求作出回应。印度政府认为，在克什米尔等地边界问题上，只是少数人提出的利益诉求。第四，某一特定地区的重组取决于该语言群体的规模或至少是大部分人的诉求。因此，马德拉斯邦较早就实现了重组，因为该地区操泰卢固语和操泰米尔语的两大主要群体都有这一要求，而旁遮普和东北地区至今还没能完全按照语言分界线重组。

四、三语政策的出台及实施

印度政府 1963 年颁布的《官方语言法》，是印度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治势力的让步。该法案规定，保留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并可根据情况无限期延长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独立之初定为 15 年）；同时法案也强调了印地语的官方语言地位。1968 年印度议会正式通过《国家教育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Education）进一步明确了印度在语言政策上的态度。按照政策规定：印度中央政府应加快印地语的传播，在官方领域推广使用印地语。联邦政府和各邦政府应重视印地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共同推动印度本土语言的发展，使之成为现代知识交流的有效工具。该政策还进一步明确了在语言教育政策中实施印地语、英语和当地语言“三语模式”（Three Language Formula）。三语模式的具体内容是：所有的印度学校必须教三种语言：在讲印地语的各邦除了学习印地语、英语外，还应学习一门现代印度语言，特别是南部语言；在讲非印地语的各邦则要学习本地语言、英语和印地语。³

¹ 林承节：《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8 页。

² 贾连庆，付东升，张景伟：《印度的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研究》，《学术探索》2020 年第 1 期。

³ 根据印度《宪法》第 343 条规定，印地语为联邦的官方语言，《宪法》第 351 条明确了联邦政府有责任促进印地语的传播和发展，使其能够作为印度混合文化所有元素的表达媒介。1968 年《官方语言决议》进一步强调，应“协调所有语言以及印地语的发展，使它们迅速发展并成为传播现代知识的有效手段；鉴于有必要增进团结并促进不同地区人民之间的交流，应采取有效步骤，让各邦充分执行印度政府与邦政府协商制定的三语方案。”详见 1968 年《官方语言决议》（The official language resolution 1968）。

<https://rajbhasha.gov.in/en/official-language-resolution-1968>，2020 年 10 月 5 日。

印度实行三语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缓和国内的语言矛盾，同时也促进印地语在非印地语地区的推广和传播，为印地语未来成为国语打基础。三语政策实施几十年来，对印度国内的族群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印地语、英语外的民族地方语言在国家法律层面上得到了承认和保护，有利于民族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第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语言冲突，一方面印地语、英语和各民族地方性语言一道阻止了某一种极端语言民族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地方方言与英语一道，也阻止了印地语一家独大局面的出现，从而建构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平衡关系，有利于整个印度社会长期的团结与稳定；第三，英语作为国内所有民族共同接受，并作为印度连接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工具得以保留了下来；另外，在国内不同语言之间发生冲突时，英语还能发挥一种缓冲器和平衡器的作用。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三语政策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不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印度国内的语言问题和矛盾，反而固化了现有的语言格局，尽管冲突和矛盾暂时被搁置和隐藏了起来，但突显和激化的危险仍将长期存在。前面说过，三语政策实际上是印度政府对一些地区的语言民族主义作出的妥协和让步，而这些地区的语言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势力依然存在；而且，三语政策事实上助长了泰米尔纳德、西孟加拉以及印度东北部的语言民族主义势力，他们甚至抵制这一政策，拒绝开展印地语教学。从数十年来的三语政策实施效果来看，不同地区民众沟通的障碍依然存在，印度多语化的局面难以消除。印度多数地区的教育实行“印地语+英语+一种地方语言”，少数地区实行“一种地方语言+英语”的方式，再加上印度很高的文盲率，大多数人只会讲一种语言（方言或区域语言），因此不同地区的民众要沟通交流仍非常困难。另外，三语政策的长期实行，实际上阻碍了印地语的国语化发展道路，巩固了英语第二官方语言的牢固位置，这与印度历届政府一直以来的努力目标相违背。¹

印度国内复杂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因素也使得三语政策的实施大打折扣。在印度的一些邦，三语政策实际上已变成四语政策，包括学习者自己的母语、地方邦的官方语、英语和印地语。在一些印地语地区，梵语成为取代地方邦官方语言的第三种语言，尤其是在南印度。而在一些非印地语区，尤其是在泰米尔纳德邦和西孟加拉邦，“三语”被缩减为“二语”，即本地语言和英语。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一些语言民族主义者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抵制在本地区开展印地语的学习，另一方面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对繁重的三门语言课程感到畏惧，教学与学习的积极性都不高；还有的地方则是因为教育资源不足，缺乏师资而无力开展三语教育。此外，多种官方语言造成的行政资源浪费，也是阻碍三语政策推行的原因之一。印度仅在中央和邦一级行政单位使用的官方语言就有 20 多种，印度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件通常至少有 20 多个语言的版本，大多数邦一级的政府文件也至少有两种以上语言的版本，这既造成巨大的行政资源浪费，也影响到行政体系运转的效率。²

三语政策本应使英语和印地语成为大部分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印度人的第二或者第三语言，但由于上述原因，以及较高的文盲率，能讲两种以上语言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仍然很低。据普查统计，三语政策实施以来，掌握第二语言的印度人数为 2.55 亿，还不到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掌握第三语言的人数约为 8750 万。³ 总之，三语政策对解决印度的语言困局作用有限，远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¹ B. Mallikarjun, "India multilingualism,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digital divide", *Language in India*, vol.4, no.4(2004), P.23.

² 廖波：《印度的语言困局》，《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 年第 3 期。

³ 统计时，所有 0 至 5 岁的儿童归为只掌握母语的人口。参见 2001 年印度人口普查数据“双语人数、三语人数、年龄和性别统计”（C-18 POPULATION BY BILINGUALISM, TRILINGUALISM, AGE AND SEX）：<https://censusindia.gov.in/DigitalLibrary/TablesSeries2001.aspx>，2020 年 6 月 5 日。

五、语言民族主义导致的两大矛盾

印度的语言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并不急迫，但在深层次上却阻碍着印度民族意识的整合，影响着国家管理体系的运转，并导致了印度社会的两极化和碎片化。作为一个大国，印度在语言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一种真正能为绝大多数人通晓的共同语（国语）。正如印度开国者们曾设想的，国语（印地语）应该是解决印度语言问题的最佳方案，但由于独立后印度地方语言民族主义的兴起，再加上民主体制的制约，在语言问题上，印度政府缺乏政治魄力和政策执行力。时至今日，印度的“多语并存”语言现状已经逐渐固化，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语言邦的出现和三语政策的实行，是地方语言民族主义的胜利。尽管独立已 70 多年，印度仍不断出现要求以语言为依据改变行政区划的现象，语言民族主义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纠纷仍然屡见不鲜，这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不稳定，也削弱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印度民族的凝聚力。

从目前来看，“多语并存”确实是印度面临的一个难解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源就是语言民族主义。印度的语言民族主义可以归结为两大矛盾：一是外来的英语与以印地语为代表的本土语言之间的矛盾，二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印地语与国内其他地方语言之间的矛盾。

英语作为原殖民宗主国的语言，印度独立后本来要予以废除，代之以印地语作为国语，但由于其他语言族群不愿作出让步，希望借助英语来同印地语抗衡，印度政府只得实行双官方语言政策，暂时给予英语同印地语一样的地位。然而 15 年过渡期后，各语言族群仍不愿妥协，“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不但得以保持，而且得到进一步巩固。时至今日，英语已成为印度社会不可或缺的强势语言，既是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加强其竞争力的有力武器，也是国内族群和语言冲突中的重要平衡器。

按粗略估计，目前印度大约有 1.25 亿人讲英语，占全国人口的 10% 左右。¹ 从人数来看，印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语大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讲英语人数第二多的国家，是英国人口的两倍。印度东北的那加兰邦、米佐拉姆邦及梅加拉亚邦已将英语列为邦官方语言，其他邦也都将英语作为母语之外最重要语言来学习和使用。相比之下，印度南部在三语模式中更加重视英语（而不是印地语）的学习，一些地方只以英语和南印度语作为教学语言。² 英语在全国的行政、司法、商业、工业、交通、通讯、科技和高等教育等方面都占有优势，重要的媒体也都是以英语为主（只有流行歌曲和影视是印地语的天下）。印度的“英语优势”也被许多人认为是印度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印度能讲流利英语的人只占总人口的 5%，全国约 2 / 3 人口的英语仅为初级水平或根本不懂英语，英语在印度的影响远没有外界想像的那么大。而且，英语的强势地位对于印度社会的均衡、健康发展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首先，英语作为一种外来语言，并不能完全胜任对印度本土文化和历史的表达，英语的“泛滥”势必伤及印度民族文化的内核，妨碍印度民族意识的整合与发展，无益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事实上，英语并不是“弥合”，而是“挑拨”了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其次，对于绝大多数印度人来说，英语是需要后天学习的第二或第三语言，在印度这样一个国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国家中，优质教育资源和高等教育对大多数印度中下层民众来说是难以企及的“奢侈品”。因此，英语成为“上层的语言”和“精英的语言”，是印度下层民众在教育、就业和提升社会地位上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成了族群、宗教、种姓之外分裂印度社会的又一道鸿沟。³ 如果说，印度的各种本土语言是“不同族群的语言”的话，那么英语与本土语言就是“不同阶级的语言”。

¹ 潘巍巍：《英语在亚洲的传播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第 81 页。

² Vineeta Chand: “Elite positionings towards Hindi: Language policies, political stances and language competence in India”,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vol.15, no.1(2011), p.12.

³ 廖波：《印度的语言困局》，《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 年第 3 期。

根据最新的 2011 年印度人口普查 (2011 Census of India) 结果, 以印地语为母语者的比例为 43.6%, 以乌尔都语 (乌尔都语与印地语的口语差别很小, 只是文字不同, 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同一种语言) 为母语的人口为 5.1%, 两者相加已占印度人口的 48.7%, 总数约为 6.7 亿人, 构成了世界上仅次于汉语和英语的第三大语言人口。印度有 6 个邦以印地语为第一语言, 另外还有 10 多个邦以印地语为主要官方语言。因此, 印度能够熟练使用印地语的人口已接近总人口的 60%。如此庞大的一个语言群体, 却不能成为印度的国语 (或者唯一官方语言), 只能同外来的英语并列为两种官方语言之一, 只能是“三语模式”中的三种语言之一, 这不能不使许多印度民族主义者感到沮丧和不满。

如前所述, 印度能讲英语的人不到全国人口的 10%, 而且这些人绝大部分都不以英语为母语。因此, 印地语要成为印度的国语, 主要的对手并不是英语, 而是众多的地方语言。迄今为止, 众多的以非印地语为母语者仍然反对提升印地语的地位, 反对将印地语作为国语或唯一官方语言, 也不愿意放弃其母语而将印地语作为第一语言。他们担心印地语成为国语后会削弱他们母语的的地位, 在剥夺他们讲母语权利的同时, 还会损害他们的其他权利。但是与印地语相比, 这些地方语言的力量又过于弱小 (排名第二的孟加拉语的母语人口也仅占全国人口比例的 8.3%), 为了能够同印地语抗衡, 它们一方面是各种地方语言联合在一起, 另一方面是拉英语为同盟军, 利用英语来与印地语对抗。现行的“三语政策”就是这种抗衡的体现, 也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但值得注意的是, 多年来印度政府一直在努力推动印地语的普及, 采取各种措施以使其成为全国的通用语, 例如, 通过标准化提高印地语使用的科学性和便捷性, 以法令形式加强其在各类政府文书和官方出版物中的应用, 在交通标识、公共场合使用印地语, 规定全国性的“印地语日”等, 这些努力现在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另外, 著名的宝莱坞电影以印地语为载体, 也强化了印度国民, 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印地语的认同。莫迪领导的人民党 2014 年执政以来, 更进一步加强了印地语的推广和使用力度, 在许多场合用印地语取代原先的英语, 印地语的使用人口 (即将印地语作为母语和第二、三语言的人数总和) 比例又有所上升。¹ 而且, 由于印地语和印度的其它语言有共同的语言谱系及历史文化渊源, 在同样的学校教学条件下, 大部分非印地语母语地区的人学习印地语要比学习英语容易得多。因而, 总体上以印地语为第二或第三语言的人群使用印地语的熟练程度要远远超过他们使用英语的熟练程度。

结 语

印度的语言问题虽然不像宗教问题那样敏感², 语言冲突也不如宗教冲突那样激烈, 但语言问题的背后却是不和谐的族群关系, 语言之间的冲突所反映的也是族群之间的冲突。印地语语言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使印地语成为印度的国语, 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全国通用语, 它既反对英语的平起平坐, 也反对各种地方语言的挑战。但在各地方语言和英语的联合阵线面前, 它却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只能作出无奈的让步和妥协, 违心地实行三语政策。而在印地语的霸权地位面前, 其他地方语言群体的语言民族主义也只能联合自保, 同时又与外来的英语结成同盟, 对印地语的攻势进行顽强抵抗, 三语政策是他们所乐于采取的策略。英语是殖民统治带来的语言, 现在却成了各地方语言抵抗印地语的工具; 再加上英语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使英语在所有印度语言中的强势地位也已合法化。现在, 三语模式看上去还算稳定, 这也意味着印度的多语制语言政策或仍将长期存在。尽管目前印地语的语言民族主义有增强的势头, 但地方语言民族主义也并未减弱, 印地语的国语化之路仍然还十分漫长。语言问题看似不那么激烈, 但实际上仍在深层次制约着印

¹ 姜景奎, 贾岩:《印地语优先: 印度的语言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世界知识》2018 年第 1 期。

² 印度官方承认的宗教群体, 除了占多数的印度教徒外, 还有穆斯林、基督徒、锡克教徒、佛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耆那教徒等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宗教群体。而宗教族群在印度的分布与语言族群的分布并不吻合。

度的发展。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语言问题仍将是印度崛起进程中的一大羁绊。

【书 评】

被发明的犹太民族？¹

曹 磊²

按语：2021年上半年，东耶路撒冷、加沙和西岸的巴以冲突不断。四月中旬斋月以来，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自五月以来，以色列当局在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街区，系统性地驱逐巴勒斯坦居民，扩大犹太定居点。5月7日，阿克萨清真寺附近的巴勒斯坦抗议者与以色列警方发生冲突，以色列取消了随后的耶路撒冷日，派军警进驻东巴勒斯坦，并开始以武力镇压示威群众。及至目前，以军在加沙地区的武力行为已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儿童。经过多方斡旋，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于当地时间21日2时开始停火。然而，停火之后，双方何去何从，仍长路漫漫。但若全面了解巴以冲突，“以色列”本身也是一个亟需考察的对象。正如人类学者娜迪亚·阿布·埃尔·哈吉（Nadia Abu El Haj）指出，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如果说考古学为现代以色列建国提供了“在地”的历史证据，基因科学就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了“肉身”的寻根想象。娜迪亚·哈吉教授的研究表明，许多有关“以色列”或“犹太民族”所谓客观事实的论断，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还是人文社科知识，本质上都是在特定政治文化环境中、随历史而不断演变而成。唯有在打破历史迷思的基础上，才能打破某种单边性的定居殖民者想象。

本文为《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的书评，原书作者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施摩罗·桑德。桑德教授从以色列历史出发，剥茧抽丝，追溯犹太民族的由来，揭示其族源的复杂性，解释犹太复国主义的发轫及演变，并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敦促超越犹太复国主义，创造多元、开放、包容的国家。正如书评者曹磊所说，“这本书能在以色列出版，本身也说明了以色列国内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清醒认识。有人形容这本书是以色列的《古史辨》，那么桑德无疑就是以色列的疑古派。事实证明，去除神话的成分，通过科学的辨析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在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神话，犹太人的神话就是其中之一，诸如“犹太人比别的民族聪明”，“犹太人的共济会阴谋控制世界”等内容充斥着媒体。

¹ https://mp.weixin.qq.com/s/3N2Zs_PrkKslYOBKrTZaFg（2021-5-22）

² 作者：曹磊，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现从事出版工作。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施摩罗·桑德（Shlomo Sand）的著作《虚构的犹太民族》（上海三联书店 2012 年出版）为我们条分缕析、剥茧抽丝，揭开了这些神话；回答了关于什么是犹太人，犹太人从哪来，犹太人的未来应该怎样等问题。本书资料详实、视野宏阔，对我们了解古代犹太人和现代以色列的历史非常有帮助。

本书的英文名《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其实更加反映了这本书的内容——“被发明的犹太民族”。“Invention”这个词更多的是指从无到有的创造，比“虚构”更接近书的本意。

《观察家》杂志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这本书带来的静悄悄的地震动摇了人们对犹太教与现代以色列之间联系的历史观”。

一直以来我们对犹太人历史的认知大约是这样的：犹太人是中东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最早生活在苏美尔地区，后来迁徙到了巴勒斯坦（迦南）。约公元前 18 世纪的雅各和约瑟时期，一部分犹太人为了躲避灾荒从迦南流落到了埃及，在尼罗河三角洲一带生活了数百年。他们由于人丁兴旺而受到埃及法老的迫害。

在先知摩西的率领下，犹太人跨过红海，逃脱了埃及人的追击回到了巴勒斯坦（这段历史在诸多宗教典籍当中都有提及）。在大卫和所罗门时期，犹太人的力量达到鼎盛，后来他们的王国被亚述人和迦勒底人所灭，期间经历了悲惨的“巴比伦之囚”。

公元 1 世纪罗马人征服了犹太人，无法忍受宗教压迫的犹太人发起了数次起义，遭到残酷镇压，圣殿（第二圣殿）被毁，只剩下一段哭墙。犹太人开始全世界大流散。在流散过程中，犹太人避免与外族通婚，保持了血统的纯洁和完整，他们自强不息，诞生了众多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

二战中悲惨的命运并没有打垮犹太民族，在失去祖国将近 2000 年之后，犹太人通过自己的力量在故土上重建了一个叫以色列的国家。这样带有神学起源的历史认知充满了国内关于以色列和犹太人的著作和新闻报道，成为大众接受的常识，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桑德教授在这本书中对关于犹太人的历史叙述产生了深刻的质疑。他回顾了所有重要的关于犹太人的历史著作和学者，分析了这些著作的理论和叙事，他的质疑主要有以下几点。

质疑之一：犹太人究竟是一个血统单一的民族还是一个来源于不同民族和种族的宗教信仰群体？

关于犹太人起源的理论声称，现代犹太人的来源是亚伯拉罕之孙雅各的 12 个儿子的后代所构成的 12 个部落。犹太民族不与外族通婚，因而具有单一的血统。

对于这种观点，桑德作追溯了公元 1 世纪的犹太奋锐党历史学家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和他的著作《上古犹太史》。这本书将《旧约》中的《创世纪》作为犹太人历史的开端，用历史证据来证明《旧约》当中的故事，具有早期历史著作神学和史学不分的特点。此后直到近代，历史上再也没有关于犹太人历史的著作产生。

桑德写道：“在约瑟夫斯和现代之间，没有犹太学者尝试写过他们的通史……基督教高度发达的编年史传统和伊斯兰教的历史著述都没有求助过拉比的犹太教，而它们二者都无一例外地拒绝研究犹太教的过去。”（49 页）

直到 18 世纪的神学家雅克·巴斯纳热的著作《从耶稣基督到现时代的犹太史》诞生，这中间隔了大约 16 个世纪。犹太人在 16 个世纪当中没有通史著作，为后来犹太民族主义者想象本民族的形成设置了巨大的鸿沟，使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圣经》，来构建犹太民族家园的神话。这是现代以色列历史无法回避的一点。

桑德指出：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滥觞刺激了犹太人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是艾萨克·约斯特的《犹太史》和海因里希·格拉茨的《从最古时代到当下的犹太史》。这两人都是德国出生的犹太人，面对德国日益觉醒的民族主义思潮，犹太知识分子深感压力，于是他们开始想象犹太人的未来。

这一批知识分子的观点分成了两派。

约斯特主张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融合，共同建立日耳曼民族国家（当时德国还未统一）。他们认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仅仅是宗教信仰不同，没有种族上的差别。“对于中东欧大部分启蒙运动的有文化修养的继承者来说，犹太教是一个宗教团体，当然不是一个流浪的民族或者来自外星的民族。”（57页）这一派认为，在一个国家当中不可能存在两种民族属性，但一个统一的民族应该有多多样性。犹太人和新教徒、天主教徒一样，首先是德国人。

而另一派的代表，历史学家格拉茨主张，犹太人是一个古老的、血统单一的高贵民族。格拉茨的著作《从最古时代到当下的犹太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基石。“从此对许多人来说，犹太教不再是一个……不同的宗教文明，而是成为了被迫离开迦南祖地，并在其青年时期到达柏林门口的一个古老的民族或种族。”（58页）

桑德认为：这个时期，受近代科学主义的影响，犹太人当中的宗教观念开始动摇，他们渴望一种新的观念来补充他们正在崩溃的认同。“在他们看来，历史这种宗教是宗教信仰合适的替代物……唯一的选择就是虚构和支持一种类似的民族神话。”（61页）

格拉茨的犹太人民族观点遭到了特赖奇克这样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在二人之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关于犹太人概念问题的学术争论。这种争论，在欧洲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影响下，为后来的犹太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认为，他们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具有清晰边界的民族。

质疑之二：是否存在真正的犹太人大流亡？

公元70年的罗马人征服和随后的犹太人的大流亡被看成是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开始，对这种苦难的共同记忆为现代犹太民族的意识提供了精神养料。

然而，历史上真的存在犹太人全体的大流亡吗？桑德对此表示了怀疑。

在《虚构的流亡：改宗和皈依》这一章中，桑德指出：“首先必须强调的是，罗马人从未放逐所有民众……驱离土地上的所有民众、农产品的种植者和纳税人是无利可图的……他们显然没有放逐他们所征服的东方国家的所有民众，也没有办法那样做。”

关于大流亡的证据，仍然是来自奋锐党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著作《犹太人的战争》，桑德认为约瑟夫斯严重高估了当时犹太王国的人口，丰富的罗马文献资料没有一处记录了对犹太人的驱逐，考古学家也没有在犹太王国周围发现难民遗迹。而且考古发现表明在公元1世纪末，也就是罗马人征服的20年之后，当地的人口已经恢复。

那么，犹太民族流亡的神话究竟起源是什么呢？作者指出，在公元2到3世纪的拉比著作中，流亡这个词“galut”的希伯来语本意是政治镇压，而不是驱逐。流亡这个犹太神话的出现，实际上与基督教有关。

“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初期成为了帝国的宗教，随着它的获胜，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教信仰者也开始了采纳神之惩罚的流亡观……犹太人由于违诫而受罚流浪的神话，根植于基督教犹太教彼此憎恶的辩证法中。……自此以后，在犹太人的传统中，流亡的概念获得了彻底的形而上学的内涵，远远超越了仅仅是离开祖地的意义。”（132页）

作者指出，对于犹太人来说，声称是来自耶路撒冷最初被放逐者的后裔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就不能确立上帝选民的身份。在某些犹太教派别中，流亡成为了神性的首要属性，因为神的灵始终处于流亡状态。因为犹太人不接受基督为拯救人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观点，对他们来说，现在的世界仍在继续遭受惩罚，“流亡成为了一种宗教净化的形式，还有助于涤除原罪，因此，流亡并不是离开祖地，而是不能得到救赎。”（132页）

作者指出，历史学家们明明知道将圣殿被毁与驱逐联系在一起是一个神话，但他们都乐于默认，因为这个神话来自宗教传统，并且在世俗意识中根深蒂固。

质疑之三：现代犹太人的主体究竟来自哪里？

既然犹太人的大流亡并未发生过，那么遍布世界的犹太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包括约瑟夫斯这样的历史学家都承认，在第二圣殿被毁灭之前，也就是罗马人的征服之前，在整个北非、伊比利亚半岛，包括阿拉伯半岛和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都生活着数量极多的犹太人，据说有数百万之多，甚至还有犹太人的公国存在。

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学家对此的解释是，这些人是从巴勒斯坦迁移到各地的移民。就像古代的希腊人、腓尼基人和罗马人一样，犹太人也有像世界其他地方移民的历史。但是桑德指出，犹太人与上述几个民族有本质不同。

首先，罗马人和希腊人都建立了强大的帝国，他们随着帝国迁移到各处。腓尼基人是以经商为业的海上民族。而犹太人是一个农业民族，既没有强大的帝国保障，也没有商业利益的驱动，而且不懂航海技术。

其次，不管是希腊人、罗马人还是腓尼基人，他们在故乡的人口并没有衰落，同时他们在移民过程中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母语。而犹太人在外迁的殖民地中不讲自己的母语，聚居地第一代人的名字不是犹太人名字，而且考古活动没有发现早期犹太移民的农耕遗迹。几千数万人的移民，在古代落后的农业条件下，不可能在 200 年内发展出几百万的犹太人。

结果很明显，这么多的犹太人都是各地民族当中皈依犹太教的人口。

作者指出：**外族皈依这一点现代犹太历史学家并不否认，只是有意识地忽略了。**他们更强调驱逐、迁移和自然增长，而有意忽略其实是主要来源的外族皈依。在巴比伦和埃及的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一点，父母是埃及人或巴比伦人的名字，而他们的孩子是犹太人名字。而后来历史上的哈斯蒙王朝曾经强迫本国的非犹太人加入犹太教。

犹太教这个年轻的一神教，对从希腊到埃及，再到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各个民族都很有吸引力。作者指出，在罗马帝国时代，犹太教发展到了顶峰，约有 7%~8% 的罗马居民信仰犹太教。有大量的罗马文献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引用了基督教神学家奥利金的话：“犹太人这个名词不是一个种族的名称，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170 页）

大量改宗犹太教的罗马人引起了罗马知识分子的担忧和愤怒。“犹太教蔓延到了罗马帝国吞并的欧洲各个部分，比如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的地区，南高卢和西班牙。”（176 页）

作者认为，犹太教在罗马帝国的衰落主要源于公元 1 世纪和 2 世纪犹太教徒在罗马的几次起义，以及基督教，这个从犹太教脱胎出来的，更适合罗马人的宗教的发展。**直到公元 4 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犹太教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受到了基督教会的抵制，这也是欧洲反犹主义的起源。**

犹太人来自诸多不同民族，比如北非的柏柏尔人、也门的阿拉伯人、迦太基帝国灭亡后的腓尼基人。那么以色列人的主体，来自东欧和俄罗斯的，占世界犹太人总数 80% 的现代犹太人的来源又是哪里呢？

作者在这里提到了一个曾经在历史上人口众多、非常强大，主要居民信仰犹太教，并曾经活跃在伏尔加河下游的，属于突厥系的卡扎尔汗国（Khazars，希伯来语中为 כּוּזָרִים）。卡扎尔汗国，中国史籍称之为可萨汗国，是一个公元 8-11 世纪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上十分强大的突厥汗国，它曾经与拜占庭帝国结成联盟，帮助拜占庭帝国抵御过阿拉伯帝国的进攻，在波斯、拜占庭、阿拉伯和中国诸多的历史资料中都记载过这个强大的汗国，有部分资料提到这个汗国的王室和臣民主要信仰犹太教。

桑德写道：“于公元 2 世纪开始的大规模的大众化改宗（犹太教）运动，在公元 8 世纪的卡扎尔王国达到了顶峰。”（237 页）作者引用大量史料认为，卡扎尔人大约从公元 8 世纪开始，由原来的萨满教改宗犹太教，并使用希伯来文为自己的书面语言。而到了 11 世纪，属于斯拉夫民族的基辅公国的崛起，削弱了卡扎尔人，这个汗国逐渐消亡。

这个汗国无疑比历史上任何犹太人建立的国家都更加强大，有更多的人口，而且更加持久。汗国衰亡后它的臣民散落在从乌克兰到匈牙利的广大东欧地区，他们一神教信仰的持久性远远超过对帝国、部落和宗族的记忆，这使得他们逐渐忘却了自己真正的起源，他们构成了现代犹太人的主体。

桑德提到，对卡扎尔人的研究，在有关犹太人的历史研究中曾经是一个热点问题，很多现代的犹太历史学家都对这个消失了的汗国充满兴趣。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亚伯拉罕·波拉克的著作《卡扎尔王国：在欧洲的犹太王国史》是最重要的一部关于卡扎尔人的研究。

波拉克是特拉维夫大学中东和非洲史系的奠基人，他通晓俄语、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他的研究资料十分扎实。这位历史学家断言大部分东欧犹太人起源于卡扎尔帝国境内。然而“他的历史研究方法与犹太人历史记忆的主导性建构越来越格格不入”，“从1951年至今，再也没有出版一部希伯来语的关于卡扎尔人的历史著作”（255页）。

桑德认为，“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非殖民化浪潮使以色列的记忆商们回避卡扎尔人的过去这个真实的阴影。……要是不断来定居的犹太大众不是雅各子孙的直系后裔变得广为人知的话……可能会导致对以色列国家生存权利的广泛挑战。”（256页）

搅动犹太人起源地问题的另一个重磅炸弹是阿瑟·库斯勒在1976年出版的作品《第十三个部落》（暗指卡扎尔人是除了雅各的12个儿子衍生的部落之外的第13个部落）。阿瑟·库斯勒年轻时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锋，然而他后来对犹太复国主义不再抱有幻想，在这本书中他写道：“世界上幸存的犹太人绝大部分属于东欧，这样说来也许主要属于卡扎尔人的血统。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将意味着他们的祖先不是来自约旦河而是来自伏尔加河，不是来自迦南而是来自高加索；意味着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他们与匈奴人、维吾尔人和马扎尔人的关系要比同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更为接近。”（260页）

关于卡扎尔人皈依犹太教的事迹，其实可以参考一本著名的小说《哈扎尔词典》，“哈扎尔”和“卡扎尔”只是中文翻译的问题，这个词还有一个常见于中国唐代史籍的译法“可萨”（可萨部被认为是突厥九姓部落之一），在阿拉伯文当中，这个民族被称为哈扎拉人。

《哈扎尔词典》的作者米洛德拉·帕维奇在书中描述卡扎尔可汗曾经邀请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教士在汗国首都举行了一场大辩论，以决定自己信仰哪个宗教，历史上确有其事。张颐武在这本小说导言当中声称哈扎尔人是一个幻想的古代民族是不正确的。

小说的作者帕维奇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对这次大辩论的描述分别用红书、绿书和黄书来表示，这说明了不同主体对同样事物的不同表述问题。桑德在自己的书中也提到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对这次辩论的描述。熟悉中世纪历史的人都知道，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争取欧亚大陆内部斯拉夫、保加爾、突厥各系民族当中的争夺十分激烈，为后来的世界版图打下了基础。但人们往往忽略了犹太教。

质疑之四：现代的巴勒斯坦人究竟是占领这里的阿拉伯人的后裔，还是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古代犹太教徒的后裔？

既然现代的犹太人主要是世界各民族改宗者后裔，公元1世纪的大流散基本不存在，那么古代居住在迦南地区的犹太人哪里去了呢？

桑德指出，阿拉伯穆斯林在公元7世纪崛起并迅速占领了巴勒斯坦，但是阿拉伯人的军队并没有向这里殖民，而是继续向着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进军。众所周知，**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和基督徒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在缴纳人头税的基础上允许他们保留信仰。**

齐米（阿拉伯语为 *dhimmi*），伊斯兰教称“（被）保护民”的术语，是指在以沙里亚法规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中信仰其他一神教的人（有经者）。这一词汇最早是指犹太教徒的，后来扩展到了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信仰者等。

桑德提到，当时的一位犹太人把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描述为**以实玛利**（阿拉伯人称为亦思马因）的后代来拯救**以撒**（阿拉伯人称为伊斯哈格）的后代（阿拉伯人被认为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以色列人被认为是以撒的后代，二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都是亚伯拉罕（阿拉伯人称为易卜拉欣）的儿子。）实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承诺。“上帝啊，正是他唤起了以实玛利人的国王来资助我们”。（187页）

桑德引用了特拉维夫大学历史系教授亚伯拉罕·波拉克的观点认为，正是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相似性、阿拉伯人的宗教宽容和对非穆斯林的宗教税，使巴勒斯坦的犹太教徒最终都皈依了穆斯林。

桑德还指出，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定居初期，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起之前，很多人都接受大部分当地居民都是犹太人后裔的说法。“许多希伯来语的地名都被保留下来……当地的阿拉伯语方言充满了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的词汇，使得它不同于书面阿拉伯语和其他阿拉伯语方言。当地民众没有把自己界定为阿拉伯人，他们自视为穆斯林或农民，而把贝都因人称为阿拉伯人。当地一些团体的特殊心态使人想起了他们希伯来祖先的心性。”（191页）

桑德还引用了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波罗乔夫的观点：“从种族上上看，巴勒斯坦当地民众与犹太人的关系，要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为密切。非常可能的是，巴勒斯坦的农民是犹太人和迦南人的直接后裔，与阿拉伯血统只有些微的混合。”（192页）

通过对犹太人起源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质疑，最后桑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现代的以色列国究竟是一个以色列公民组成的民主国家，还是一个全世界犹太人的民族家园？

按照现代国家的理论，以色列应该是一个全体以色列公民的国家，不分民族、宗教。但是鉴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以色列只能是一个全世界犹太民族的家园。为了维护犹太人这个国家的主体地位，以色列只能不断从世界各地吸引犹太人，不断扩建定居点，来保证以色列国内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的优势。犹太复国主义也催生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这也是巴以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的症结所在。

然而每年从非洲、印度、东欧等地吸引来的肤色不同、语言各异的犹太人的同时，还有大量的欧洲裔犹太人迁往美国等发达国家。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基础以及国家实践使这个国家内部始终无法整合：欧裔犹太人与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之间；不同肤色的犹太人之间；犹太裔公民与阿拉伯裔公民之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无法解决。

通过这本书我们知道了犹太人起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那么会不会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爱因斯坦、萨特、弗洛伊德这些我们熟知的犹太名人其实都是突厥人呢？这个问题显然是荒诞的，任何民族都避免不了想象的成分。**尽管民族主义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国家建构的完成，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前途在于去犹太复国主义化，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包含各民族和各宗教的民主国家。**

这本书能在以色列出版，本身也说明了以色列国内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清醒认识。有人形容这本书是以色列的《古史辨》，那么桑德无疑就是以色列的疑古派。**事实证明，去除神话的成分，通过科学的辨析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本书作者以深邃的笔触嘲讽了民族主义的虚伪，为读者指明了道路——现代国家只能是建立在宪政基础之上，在不同的文化和族群之中寻找最大公约数，从而取得全体公民而不是特殊族群的认同。建立在民族想象基础上的国家注定无法持久，也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

【网络文章】

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左翼，一段被遗忘的历史¹

受访者：Benjamin Balthaser，采访者：Sarah Lazare，翻译：李丹

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民族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的有毒混合物，嫁接到了来自犹太礼仪和文化的犹太典故和神话的文化库中。

日前，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强行吞并被占领的西岸30%的努力，正暴露出将犹太民族国家强加给巴勒斯坦原住民这种做法的固有暴力。尽管这个计划暂时推迟，但人权组织B'Tselem报告说，为了准备吞并，以色列已经在6月加大了对西岸巴勒斯坦房屋的拆除，当月摧毁了30座房屋，这个数字不包括在东耶路撒冷的拆除。

然而，偷窃和破坏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和社区只是一个更大、更久远的殖民计划的一部分。正如巴勒斯坦的组织者Sandra Tamari所写：“70多年来，巴勒斯坦人被迫忍受以色列的驱逐和土地征用政策”。今天，这种现实已经演变为一种公开的种族隔离制度。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是二等公民，以色列现在正式规定，自决权只属于犹太人。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受到军事占领、围困、封锁和戒严——这是一种得到美国政治和财政支持的暴力统治系统。

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这种残酷的现实不仅仅是右翼政府的产物，也不仅仅是未能有效达成两国解决方案的结果。相反，它源于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本身，这个计划是在殖民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从根本上说，它依赖于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清洗和暴力统治。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中都有自称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人，他们强烈反对以色列国代表犹太人民的意愿或利益的说法。

左翼媒体人Sarah Lazare与印第安纳大学南本德分校研究多种族文学的副教授Benjamin Balthaser进行了交谈。后者最近的文章《当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是犹太人：从大萧条到冷战的犹太种族主体性与反帝国主义文学左翼》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犹太工人阶级左翼中被抹去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历史。Balthaser也是一本关于老犹太左翼的诗集《献身》的作者，他还有一本名为《反帝国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学术专著。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20世纪犹太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思想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书。

他与采访者谈到了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起源，以及犹太左翼与它的争论，理由是它是右翼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从根本上反对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Balthaser认为，这种政治传统能够破坏犹太复国主义反映所有犹太人意愿的说法，并为当今提供路标。“对于在美国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不仅要努力思考自己与巴勒斯坦的关系，还要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历史上受迫害的、在种族和文化上离散的少数民族在世界中的地位，我们必须思考我们站在谁的一边，我们要与哪种全球力量结盟”，他说。“如果我们不想和极右翼的刽子手站在一起，不想和殖民主义站在一起，不想和种族主义站在一起，那么有一种犹太文化资源可供我们借鉴——一种政治资源可供我们借鉴。”

Sarah Lazare: 你能解释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 又称“锡安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吗? 是谁和何时发展起来的?

Balthaser: 有几件事情需要区分开来。首先，在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之前，犹太人就有悠久的历史，它将耶路撒冷这个古老的犹太王国视为文化、宗教以及可以说是弥赛亚意义上的渴望之地。如果你了解犹太礼仪，就会发现有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锡安的土地，追溯到耶路撒冷这个被罗马人摧毁的古老王国。

¹ 澎湃思想市场(2020-07-28) 本文译自美国左翼网刊《雅各宾》
<https://mp.weixin.qq.com/s/ZrgJlrSAqfArMubfRjFU5w> (2021-5-23)

在整个犹太历史上，有过若干试图“返回”巴勒斯坦土地的灾难性尝试，最著名的是 17 世纪的 Sabbatai Zevi（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犹太拉比）。但在犹太人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以色列”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和弥赛亚意义上的渴望，但除了耶路撒冷的小型宗教社区，当然还有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继续生活在巴勒斯坦的少数犹太人——约占人口的 5%——之外，犹太人并没有实际迁往那里的愿望。

当代犹太复国主义，特别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确实利用了这一巨大的文化渴望和宗教文本库来使自己合法化，这就是混乱的根源。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于 19 世纪末，是一种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我认为这是理解它的方式。它是许多欧洲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之一，试图从西欧和东欧的不同文化中构建出族裔上同质的民族国家。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有过许多种犹太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只是其中之一。

犹太“崩得”（Bund）是 20 世纪初崛起的一个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它在东欧表达了一种非领土化的民族主义。他们觉得他们属于东欧，他们的土地是东欧，他们的语言是意第绪语。他们想在他们实际生活的欧洲为自由而斗争。他们觉得他们的解放斗争是反对欧洲压迫性的资本主义政府。如果不是大屠杀消灭了崩得和东欧的其他犹太社会主义者，我们现在可能会在一个非常不同的背景下谈论犹太民族主义。

当然，苏联也出现过一些实验，最著名的可能是在比罗比詹（Birobidzhan，犹太自治州首府），但在乌克兰也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实验，试图在犹太人居住的领土内或苏联境内的其他地方建立犹太人自治区，这些实验植根于意第绪语的 doykait（“此处性”，意第绪语，英文为 hereness）思想、离散的 hereness，以及意第绪语语言文化。

犹太复国主义是这些文化民族主义运动之一。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自己嫁接到英国殖民主义上，这种关系在 1917 年的《贝尔福宣言》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实际上它试图从英国的殖民地——巴勒斯坦托管地——中建立一个国家，并利用英国的殖民主义来帮助它在中东建立自己的国家。《贝尔福宣言》本质上是利用大英帝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民族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的有毒混合物，嫁接到了来自犹太礼仪和文化的犹太典故和神话的文化库中。

Sarah Lazare: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基础之一是，它是一种代表所有犹太人意愿的意识形态。但在你的论文中，你认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评其实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犹太左翼中相当普遍，而这段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抹去了。你能谈谈这些批评是什么以及是谁提出的吗？

Balthaser: 美国的有趣之处在于——我想说对欧洲来说也是如此——在二战结束前，甚至在二战结束后，大多数犹太人都贬低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并不受欢迎，不管你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改革派犹太人。在 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美国犹太人不喜欢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因有很多。

有自由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最著名的是由 Elmer Berger（改革派拉比）和美国犹太教委员会所阐述的。这些人的焦虑之处在于，犹太复国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双重忠诚，它会使犹太人宣称自己不是真正的美国人，而且实际上会使他们同化进主流美国文化的努力受挫。

Elmer Berger 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犹太人不是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而仅仅是一种宗教，因此在宗教信仰之外，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我认为，这是一种来自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同化主义（assimilationist）思想，并试图和新教的“信仰共同体”观念看起来类似。

但对于犹太左翼——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左翼来说，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来自两个方面：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和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他们把犹太复国主义理解为右翼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与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是一致的——试图使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保持一致。

当时在 1935 年的《新群众》（1920 年代到 1940 年代与美国共产党密切相关的美国马克思主义杂志）上有一篇著名的对 Vladimir Jabotinsky（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攻击，马克思主义批评家 Robert Gessner 称 Jabotinsky 是红海上的小希特勒，Gessner 称犹太复国主义者是纳粹。一般来说，左翼把犹太民族主义看作是右翼组织，后者试图创造一种统一的、军国主义的文化，使犹太工人阶级的利益与犹太资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

所以这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批判。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另一种批判，我认为对今天的左翼来说更具有当代性，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如果你看看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犹太左翼的小册子、杂志和演讲，他们看到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与英国帝国主义结盟。他们还非常清楚，中东先是被奥斯曼人，然后是被英国人殖民。他们认为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是全球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当然，犹太共产党人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而是全球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全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球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对他们来说，如果把自己的祖国看作是地中海的一小块土地——不管与耶路撒冷有什么文化上的联系——就会违背他们的一切信念。

20 世纪 40 年代大屠杀开始，犹太人千方百计地逃离欧洲，一些共产党员主张，如果你要逃离灭亡，应该允许犹太人去巴勒斯坦，而巴勒斯坦是你唯一可以去的地方，这是自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你需要尽可能地和生活在那里的人相处。

有一个巴勒斯坦共产党，确实主张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合作，把英国人赶下台，建立一个两族国家——由于一系列原因，包括犹太人定居点的隔离性质，事实证明这在实践中比理论上更难。

无论如何，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犹太左翼批判性地理解到，犹太复国主义能够在巴勒斯坦兴起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殖民计划和通过将巴勒斯坦原住民驱逐出这片土地。美国共产党主席 Earl Browder 在曼哈顿希波德罗姆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只有通过驱逐 25 万巴勒斯坦人，才能形成一个犹太国家。与会者当时认为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但实际上最后却是戏剧性的低估。

Sarah Lazare: 你在最近的期刊文章中写道：“也许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最普遍的一种说法——甚至在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在战前的边缘地位的学者和作家中也是如此——那就是大屠杀改变了犹太人的观点，使犹太人相信其必要性”。你指出了这种说法中的一些重大漏洞。你能解释一下这些漏洞是什么吗？

Balthaser: 我想改变一下这个说法，我在这里真正说的是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左翼。我是在一个左翼家庭中长大的，在这个家庭中，人们对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看法肯定是有分歧的——然而，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认为大屠杀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只要大屠杀的细节被披露出来，所有人都会站在一起，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

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大屠杀，可能就没有以色列，但这只是因为战后有大量犹太难民潮，他们本来无疑会留在欧洲，这是对的。如果没有这批能够参加 1948 年战争并在战后为以色列提供犹太人人口涌入的人，独立的以色列国能否成功，令人怀疑。

然而，我翻阅 40 年代的犹太左翼报刊——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党的出版物和汉娜·阿伦特的著作，发现最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大屠杀的范围被广泛了解之后，他们的官方立场仍然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

他们可能要求允许犹太人在他们被驱逐或屠杀的土地上重新定居，享有充分的权利和公民地位，允许他们移民到美国，甚至如果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允许他们移民到巴勒斯坦（情况往往如此）。但他们仍然完全反对分治和建立一个只有犹太人的国家。

关于那个时刻，重要的是要明白，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政治选择——不仅是西方帝国主义强国的选择，也是犹太领导人的选择。他们本来可以为犹太人移民美国进行更激烈的斗争，而很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实际上是反对移民美国的。

犹太共产主义报刊报道了许多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如何与英国和美国人合作，强迫犹太人去巴勒斯坦托管区的故事，而当时的犹太人宁愿去美国，或者英国。英国外交大臣 Ernest Bevin 有一句著名的话，他说美国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纽约再有更多的犹太人”。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同意这一点。

虽然这看起来像是古老的历史，但它很重要，因为它破坏了围绕以色列形成的常识。“是的，也许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本可以实现和平，但大屠杀使这一切成为不可能。”而我要说的是，1945 年之后的这场辩论表明，有一个漫长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有其他的可能性，另一个未来可能会发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许苏联比其他任何一股力量都更能改变犹太马克思主义左翼在 1940 年代末对以色列的看法。1947 年，苏联驻联合国大使 Andrei Gromyko（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宣称西方世界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阻止大屠杀，并宣称支持“分治”（partition），突然间就有了这个转变。所有那些本来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左翼出版物，在第二天就开始拥抱“分治”和以色列民族国家的形成。

你必须明白，对许多犹太共产主义者甚至社会主义者来说，苏联是应许之地，而不是犹太复国主义。根据宣传，苏联是他们根除反犹太主义的地方。

在纳粹主义兴起之前，整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是最反犹的地方。犹太共产党的许多党员来自东欧，或者他们的家人是东欧人，他们对反犹水深火热的俄国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对他们来说，俄国革命是历史的断裂，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当然，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苏联刚刚打败了纳粹。

苏联拥抱犹太复国主义，确实给左翼犹太世界带来了冲击。十几年后，苏联改变了政策，到了 60 年代公开接受反犹太复国主义。但在那短暂的关键时刻，苏联坚定地支持分治，这似乎才是真正改变犹太左翼的原因。

Sarah Lazare: 这很好地引出了我想问你的一些问题，即反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与当今的相关性。对很多人来说，以色列吞并西岸大量巴勒斯坦土地的计划虽然被推迟了，但仍然暴露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对巴勒斯坦人口建立犹太统治的暴力。而我们看到一些著名的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如 Peter Beinart（美国专栏作家、记者和政治评论员，《犹太之流》[The Jewish Currents] 总编，曾任《新共和》总编）公开宣称，两国方案已经死亡，一个基于平等权利的国家才是最好的道路。你是否认为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可以与犹太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连接起来？你是否看到了改变人们思想的机会或可能性？

Balthaser: 从某种意义上说，Beinart 的信晚了七十年。但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转折。（注：今年，Beinart 还在给《纽约时报》的短评中称“我不再相信一个犹太国家”。）我还想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不同的历史时刻。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你真的可以谈论一种全球性的革命情绪和真正的犹太左翼，它位于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党等组织中。而你可以在 60 年代再次看到这一点。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1960 年代美国的学生激进组织）中也有相当多的犹太成员，在 1960 年代与社会主义工人党一起正式支持反犹太复国主义，并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1960 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学生组织）结成联盟，后者在 1960 年代末也采取了正式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

你可以考虑一个全球革命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巴勒斯坦解放是一个明确的部分——你可以考虑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全球革命运动结构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更加分散的空间。但同样的，我们也看到巴勒斯坦民权运动的重生，或者说是延续，巴勒斯坦民间社会发出了非殖民化的呼声——既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解放传统，也是在寻求南非自由斗争的模式。

对于当代认为自己是进步左翼的犹太人来说，他们突然意识到，真的没有中间立场（center）了，没有自由的犹太复国主义立场了。中间立场真的已经消失了。

我们面临着这个非常严峻的决定：要么你站在解放斗争的一边，要么你站在以色列右翼的一边，以色列右翼的消灭主义和种族灭绝意图一直存在，但现在却赤裸裸地显现出来。所以我认为像 Beinart 这样的人正在觉醒，并说：“我不想站在刽子手的一边”。

老犹太左翼和 20 世纪 60 年代新犹太左翼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并不新鲜。

任何解放斗争都将来自被压迫者，因此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将为斗争设定条件。但是对于在美国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不仅要努力思考自己与巴勒斯坦的关系，还要思考自己作为一个历史上受迫害的、在种族和文化上离散的少数民族在世界中的地位：我们必须思考我们站在谁的一边，我们要与哪种全球力量结盟。

如果我们不想和极右翼的刽子手站在一起，不想和殖民主义站在一起，不想和种族主义站在一起，那么有一种犹太文化资源可供我们借鉴——一种政治资源可供我们借鉴。这段反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左翼的历史表明，一个离散人群的重要历史角色就是与其他被压迫的人团结一致。

那是我们历史上聚集了最多力量的地方。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会重现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共产党”。我们是说，“我们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但过去可以成为一种文化资源，我们可以在今天使用。”

Sarah Lazare: 谁或什么事要为抹去这段犹太左翼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负责？

Balthaser: 我不会把“抹去”仅仅归咎于苏联或犹太复国主义，因为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冷战，以及冷战如何摧毁了老犹太左翼，并真正将其赶入地下，粉碎其组织。因此，我认为我们还必须看到，转向犹太复国主义是如何被理解为一种在战后时代使犹太人正常化（normalize）的东西。

随着 Rosenberg 夫妇（冷战期间美国的共产主义人士，他们被指控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判决与死刑的过程轰动了当时西方各界）被处死，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的红色恐慌，以及共产党（在西方）几乎被取缔（在整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共产党内一直有一半犹太人），对于大部分犹太人机构来说，与美帝国主义结盟是犹太人在美国正常化生存的一种方式。我希望那个时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帝国主义计划结盟、与贾里德·库什纳这样的人结盟的空虚和贫瘠。像 Bari Weiss（美国专栏作家，刚刚因不满从《纽约时报》辞职）这样自称自由派的人，为什么要与美国生活中最反动的势力结盟？

这是一个血腥的同化和白化的矩阵（matrix），产生于 1950 年代冷战的郊区化。以色列是那个魔鬼交易的一部分。是的，你可以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你可以去美国的好大学，你可以加入郊区，进入美国生活的主流，只要你为我们做这一件小事：支持美帝国。

希望随着美国新的草根组织的出现，在质疑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中，这种计算（calculus）可以开始改变。随着“犹太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关注巴以问题的美国左翼组织）、If Not Now（反对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美国犹太进步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由民主社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组成的组织）和“黑命攸关”运动的兴起，它们对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采取了严肃的立场，犹太社区的常识已经开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这场战斗还远未结束，但这些让我对未来乐观了一点点。

【网络文章】

“弗洛伊德事件”一周年，平等仍止步于肤色

殷之光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欧亚班访问教授

观察者网 https://m.guancha.cn/YinZhiGuang/2021_05_25_591881.shtml?from=timeline (2021-5-26)

如果还有人记得的话，今天是弗洛伊德事件一周年。

如果再有人记得的话，5月似乎总与美国种族主义历史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

2020年5月4日，澳大利亚《周六电讯》报头版煞有介事地刊登了一篇长篇报道，内容声称他们获得了一份15页的“五眼联盟”秘密档案，揭露了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然而，这份所谓的秘密档案全部由各种媒体的二手、三手信息拼凑而成。

《周六电讯》刊登这篇种族主义宣传通稿的那一天，在美国种族主义历史上颇具特殊意义。1992年5月4日，洛杉矶爆发的那场美国20世纪历史上最大一次种族骚乱，在国民警卫队的镇压下终于慢慢平息。这场动乱的起因是因为一为名叫罗德尼·金的黑人青年，在因超速被警察截停之后，遭到4名警察的殴打。警察用高压电棍和金属警棍猛击金的头部、身体共56次。金倒地之后，还遭到了警察的猛踢。

和弗洛伊德案类似，整个过程被附近居民拍摄成了81秒的录像。之后这段录像在美国以及全世界媒体中广泛播出。这一事件引发了强烈民愤，四名警察也被控“使用武力过当”。然而，在4月29日的审判中，四名警察被无罪释放。这引起了非裔与拉丁裔的强烈不满，随后暴动开始。暴动共导致63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多达1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再将时间拨到2020年5月26日，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又习惯性地喊了一句“中国病毒”。就在前一天，美国驻澳大利亚堪培拉使馆召开了一次闭门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向澳政府传达美国国务院针对当月4日《周六电讯》报道的意见。会议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强势推动“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这个谎言。据一名澳大利亚政府高级官员称，美国国务院在澳政府与媒体中大量散发这份所谓的15页秘密档案。这个带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谎言，在美国外宣机器的全力推动下，很快便充斥了全球媒体。

与此同时，2020年5月25日，美国因感染新冠而死亡的总人数，仅登记在册的就已经达到10万。然而，许多州却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解封，鼓励人们出行消费。

就在这一天，还有一位名叫乔治·弗洛伊德的美国黑人因为“无法呼吸”而死。与那些被新冠杀死的人不同，46岁的弗洛伊德没有成为一个无名无姓的统计数据，他的家人最后也收到了一笔政府支付的赔偿金。然而，很快他的名字也将同所有患新冠而死的普通美国人一样，被庞大的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吞噬，被媒体遗忘。

霸权的国家机器用了不到一年，将弗洛伊德的死从公众视野中抹去。就在弗洛伊德死后一年，因为新冠而死的美国人已经接近60万。

然而，随着杀死弗洛伊德的警察被定罪，一种麻醉剂一般的胜利情绪又开始在西方媒体中蔓延。仿佛针对几个警察的判决与一笔付给弗洛伊德家人的美金，就可以消解杀死弗洛伊德的恶；仿佛随着拜登的当选，那个曾经将种族主义者特朗普推上权力巅峰的国家机器就得到了救赎。过去一年中，因为弗洛伊德之死而引发的“黑命贵”、“去殖民”抗议，在轰轰烈烈了几周之后，也在霸权帝国的文化城堡中销声匿迹。

然而，种族主义从不会因为几句口号、几个判决、几份个人赔偿就消失。相反，种族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垄断经济全球霸权的结构性力量，始终都在发挥着关键作用。种族给出了自由的限度，最大限度地锁定了殖民主与被殖民者、帝国中心与边缘、资产者与劳动的基本区隔。

让我们再穿越到 18 世纪末美国建国前夕。1776 年 5 月，北卡罗来纳通过了一项决定，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并建立自己的军队。在之后的一个月里，托马斯·杰斐逊等人起草了一份被称为《独立宣言》的文件，其基本理念之后也成为美国宪法的基础。《宣言》第二部分中，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论述后来广为人知。

然而，正像奥威尔在《动物农庄》中讽刺的那样，《独立宣言》中声张的平等止步于一条肤色线。那些“造物主”赋予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明显遗忘了黑人奴隶与印第安人。那些“残酷无情的印第安野蛮人”，那些不服管教的“奴隶”，甚至还被视为是受英国国王利用的工具，无时无刻都在威胁着白人殖民者实践他们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

霍华德·泽恩在他的名著《美国人民的历史》中，这样描述《独立宣言》的真正内涵：它是一群从英国殖民体系中崛起的、由“重要人士组成的上升阶层”发起的社会动员。其目的是需要“征召大量的美国人来反抗英国人”，但他们又“不希望彻底打破 150 年间建立发展起来的财富和权利关系格局”。

由欧洲扩张而形成的帝国主义霸权秩序，最初以肤色来划分不同人群在这条压迫链条中的位置。西方早期的殖民者们，将肤色与经济决定论结合起来，将扩张美化为推动经济发展、改造“野蛮”的有色人种成为“文明人”的唯一途径。在 1584 年 10 月 6 日呈交给伊丽莎白一世的信中，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表示，向“西印度”扩张，增强非洲奴隶贸易不仅能够“传播新教福音”，也能够通过“增强亚非欧与英国的贸易往来”，为英格兰人提供工作。

作为沃尔特·莱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殖民美洲计划的坚定支持者，哈克卢伊特着眼于为英帝国寻找一个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个基础便是新教信仰。在他笔下，新教信仰不但能够弥合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三国之间裂痕，增强与爱尔兰殖民地的联系，更能成为帝国的理由，在海外对抗西班牙主导的天主教地区对新教徒的压迫。

哈克卢伊特这个表述，简明扼要地勾勒出英格兰、联合王国，与英帝国三者间的秩序关系，也首次将海外殖民扩张与“英格兰人”的福祉联系起来，明确将海外扩张视为在欧洲国家竞争中增强自身实力的手段。

哈克卢伊特不是唯一一个用传播福音、促进商业发展来为帝国霸权扩张进行辩护的人。在他之后，几乎所有形形色色的帝国辩护者们都沿用了与哈克卢伊特差不多的逻辑。19 世纪中期，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加拿大等所有与英帝国有历史联系的白人定居殖民地，都出现了所谓建设“白人的国家”，谋求一定程度“自治”的呼声。

然而，所有白人殖民地在它们扩张的进程中，也都同样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实际困难。从 16 世纪至 19 世纪中期，作为商品被买卖的奴隶工是解决劳动力短缺，且不影响建设“白人的国家”的唯一解决方案。这些奴隶不但不具有公民权，甚至在“白人的国家”中也不被视为真正的“人”。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富裕的白人奴隶主“拥有”；他们的劳动力被无休止地剥削；他们被当做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消耗品，可以被抵押，可以被替换。

这种由种族主义建立起的资本原始积累极为“有效”。以美国为例，1790 年，南部每年可产 1000 吨棉花。到 1860 年，这个数字已达 100 万吨。在同一时期，奴隶也由 50 万人增加到 400 万人。在一份记录某个美国南部种植园奴工死亡率的小册子上，冰冷的数字展现了以种族歧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从 1850 年至 1855 年间，该种植园死亡的 32 人中，只有 4 人活到 60 岁，4 人活到 50 岁，有 7 人在 40 多岁时就死了，有 7 人在 20 或 30 岁时就死了，还有 9 人死时不满 5 岁。

就在《独立宣言》签订后的 100 多年，1882 年 5 月 6 日，美国的《排华法案》正式生效。这个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法案通过监禁、驱逐等方式，限制华人矿工入境美国，并剥夺了大量 19 世纪中期自愿或被贩卖至美国的华工的美国国籍。实际上，在帝国主义的全球体系中，契约

劳工基本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奴隶工的延续。随着 19 世纪后半叶“废奴”进程的推进，契约劳工开始大规模出现，替代奴隶工，成为资本主义新的系统剥削对象。

这些劳工基本全为有色人种，他们大多数被送往诸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白人定居殖民地，补充铁路建设与矿山开采等劳动力密集产业对“非技术劳力”的巨大需求。此外，包括南美、海峡殖民地、东南亚等依靠种植园经济发展的经济殖民地，也接纳了大量的契约劳工，以补充因废奴之后产生的劳动力缺口。

这些劳工主要来自印度、中国。在这其中，来自中国这类半殖民地的劳工更受欢迎。因为随着 19 世纪国籍制度的完善，欧美殖民帝国全球网络内部的流动加强，以及欧美国家民主政治的扩大，从帝国之外半殖民地来的劳工，可以在合同期结束后被合法地遣返回原籍，这也就免除了有色人种劳工在合同期满后，继续留在当地，成为移民，从事手工业、服务业等其他工作，与“白人国家”的居民产生经济竞争关系。

美国的《排华法案》为之后“白人国家”输入雇佣劳工的政策提供了蓝本。20 世纪初，布尔战争之后，南非开始着手大规模输入华工，补充金矿劳动力时，便在合同中严格规定华工合同期间的雇主、工作性质甚至活动范围。而雇主则能够在不提高工资的情况下，随意增加契约劳工的工作量。在合同期满之后，所有契约劳工一律遣返原籍。同时，殖民地的立法者还有意识地同雇主合作，确保有色人种劳工工资不得高于英国本土白人“无技术劳工”的最低工资，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安抚本土白人工人，减少因白人劳方不满而对资方在帝国本土与殖民地形成的政治威胁。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便是种族主义基础上的等级制世界观。

在“排华”出现的时代，英美人道主义者开始关心针对黑人奴隶的种族暴力问题。对奴隶制度“不道德”的批判也在同时大量兴起。而针对华人劳工的歧视与剥削，却因为华工是“自由”进入美国，“自由”签订合约的原因，而成为被道德容许的恶行。

1901 年 6 月 19 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上刊登了艾米丽·霍布豪斯（Emily Hobhouse）从南非战场上发回的一系列报道，将英国为关押布尔人而“发明”的集中营带到了英国与整个西方读者的视野中。这种白人之间的暴力极大地触动了欧洲民众的神经。作为殖民者后裔的布尔人，许多人在“民族”上都与德国、荷兰、法国存在互相认同，更大大加强了欧洲大陆列强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对英国的反感。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为布尔人设立的集中营很快被关闭，公众对此的注意力不久也随之消散。

没有人注意到，就在集中营被关闭后不久，1904 年南非德班城外的雅各布集中营又悄悄恢复运行。此时，它已经成为华工抵达南非后，前往矿山劳工营之前的临时安置点。他们一般会在这里被关押三天，接受进一步登记与健康检查。一切手续完备后，便会被装在闷罐列车中，运往各个矿山，继续在严格看管的劳工营中生活。这些安排最大程度地确保了华工与南非社会的隔绝。整个过程就像是 30 多年后，纳粹德国“处理”犹太人一般，严谨、冷酷、非人。

作为被道德容许的种族主义，对“黄种人”的歧视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甚至成为大众政治文化的常见内容。就在英国公众“发现”南非集中营暴行之前不久，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沙俄趁机扩张至清朝下辖的东北地区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制造了臭名昭著的“海兰泡惨案”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了大量中国平民，吞并了海兰泡，并夺得了江东六十四屯的实际主权。

然而，帝国主义在欧洲之外半殖民地的暴行，似乎并未真正进入欧洲人道主义者与政治左翼的视野。相反，帝国主义者对沙俄在中国的行动则格外关心。英国议会针对沙俄在中国的扩张进行了数场讨论。一个认识是：俄国向中国扩张会威胁到“欧洲协调”体系确立的和平，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占领全中国，进而威胁到英国在中国的特殊利益。

实际上，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与日俄战争，让欧洲帝国主义者仿佛看到了“黄种人”对“白种人”世界霸权稳定的军事威胁。在 1894 年甲午战争之后，欧美的

报刊开始重视日本在亚洲的崛起。当时西方政治精英普遍担忧，由于日本和中国人同属黄种人，因此，如果日本对中国建立起保护关系的话，那就可能产生一种黄种人的共同利益，且这种利益将与欧洲列强的利益背道而驰。“黄祸论”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据德皇威廉二世自称，“黄祸”一词是他的发明，是他 1895 年创作的一幅漫画的题目。

很快，“黄祸”一词便在欧洲的贵族与政治家中间广泛流传。基督教福音派的教士们更将“黄祸”的出现，视为一种宗教启示录般的事件。中国、印度、日本与韩国象征着《圣经》中的“东方的王”。黄色东方的“觉醒”将对西方的海洋与陆上霸权产生不可估量的冲击，因此西方必须时刻准备应对挑战。在 20 世纪的历史巨大变局中，黄种对白种、东方对西方、异教对基督教、野蛮对文明，这种福音派的二元论世界观很快席卷了大众媒体，并不断被赋予新的形式。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作为“红祸”也加入其中，反复左右着西方公共舆论与外交话语。

在欧洲的政治与文化想象中，对于外敌入侵、人口增长、经济衰退等一系列影响自身“生存空间”的忧虑，对新兴力量“崛起”的恐慌始终是关键主题。因而，从经济学和生物学角度出发构建起的命定论思想，也牢固地支撑起帝国主义军事扩张与经济政治霸权思想。这种命定论既促生了确证本阶级、本民族霸权地位必然性的各种帝国辩护，促生了阻止本国殖民属地、甚至形式上独立的亚非拉海外国家等半殖民地实现工业化的思想；也促生了悲观的、反自由贸易、主张保护主义的论述。从欧洲内部各个“领土国家”之间的相互猜忌，到“民族国家”兴起之后的敌意，再到对欧洲之外新兴美国的怀疑，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恐慌感上的帝国辩护，其所构建的敌人始终在随着政治现实的需求与经济格局的动荡而变化。

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对抗压力下，欧洲君主国在 16 世纪末开启了他们向更大规模的现代复合制国家的转变进程。同时，这也往往伴随着欧洲国家从松散的领土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以及组建帝国的野心。在这个过程中，领土的私有化是处理不同民族、团体之间矛盾的主要方式。在这种理想型的“民族国家”中，领土归属于一个具有“共同出身”的共同体。从欧洲的经验来看，混居被非历史性地视为一种旧帝国的遗产。而在不同民族混居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冲突的唯一方式则需要遵从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逻辑。即只有他们形成“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时，冲突才能得到化解，民族群体之间的平等关系才能得以重建”。可悲的是，这一逻辑也可以顺势推导出种族清洗的解决思路。

相比在精英文化中兴起的“黄祸”论而言，来自社会中下层群众的恐慌感更为真切。1905 年 2 月的英国，在一次自由党竞选活动中，六个打扮成中国人样子的白人演员，在各大选区乘车游行，车上的海报上故意用蹩脚的英文，模仿中国人说英语的口音写着：“你们英国人在南非打仗，灰常好！中国人去那里工作——真的灰常好！”在大车后面，还有两名英国工人打扮的白人跟随，手里拿着广告牌，上书：“战争之后，不要英国人，欢迎中国人”。这个带有明显种族主义的宣传策略，在普通工人中显然取得了极佳的效果。

除了依靠种族主义调动中下层民众情绪进行宣传之外，自由党在精英媒体上则采取了一幅截然不同的道德主义立场。他们仿佛站在了同情华工的立场上，批判保守党推动的雇佣华工政策是一种“新奴隶”制。然而，当自由党获得了 1906 年大选的胜利，赢得了大量工人与城市中小业主的选票，取代保守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他们却基本延续了保守党的华工政策。在后来有媒体问及将华工比作“新奴隶”的问题时，当时的自由党首相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爵士却支支吾吾，再三被追问后才表示，之前的说法可能“有点过激”。

无论是奴隶贸易还是契约劳工，自由主义者总能在“自由”神话背后，隐藏剥削有色人种劳动力的辩护词。在 19 世纪正式废除奴隶贸易之后，帝国主义的种族不平等观也开始进一步衍生出了合理化阶级不平等的内容。同时，种族观也从一种精英阶层的帝国理由，逐渐与帝国中心的白人工人阶级发生了联系。

19世纪中期英国本土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自由贸易政策也促进了商品在英帝国网络中的流动。1851年5月至10月于伦敦海德公园水晶宫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便是帝国向其臣民展现自身强大与繁荣景象的一次盛大表演。然而，这种“维多利亚中期繁荣”景象背后，是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以及实际收入的停滞甚至减少。在这种条件下，以种族为基础的差序世界观开始变得越发复杂。资本主义环境下的阶级秩序很快也加入进来，共同构成了帝国主义精英们观察世界的透镜。种族观开始逐渐被阶级化，大多数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慢慢也成为了白人种族内部的野蛮人。

就在1851年万国博览会举行的同年，伦敦记者、出版商亨利·梅修表示，英国社会内部社会、生活习俗的差异，会导致白人内部产生类似于种族分化一样的器质性变化。例如，他就将英国“种族”中的乞丐、流浪汉，类比为非洲“种族”中的霍屯督人，称其为“流浪部族”。诸如“吉姆·克劳”（Jim Crow），“约翰·中国佬”（John Chinaman），“比利·巴劳”（Billy Barlow）等许多具有强烈种族歧视、阶级歧视意味的通俗文化形象，也正是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涌现。这类形象通常面容丑陋、身形矮小、表情滑稽、衣衫褴褛且具有明显的阶级或种族特色。

“吉米·克劳”最初是一个逃跑黑奴的形象。由涂黑脸的半人扮演，他衣衫褴褛，口齿不清。“比利·巴劳”则是一个白人流浪汉，从衣着和外貌上看，他表现的应当是一个居无定所的退伍兵，他的红鼻头应当意味着有长期酗酒的恶习。两人作为丑角，经常一起出现在伦敦的街头表演中。“约翰·中国佬”的形象则是一个梳着辫子的中国男性。在各类杂志的漫画中，随着时间的不同，他可以是被欧洲白人揪着辫子鞭打的中国士兵，也可以是前往美国“偷取”白人劳工工作的中国劳工。他们与代表文明与帝国中心的那些衣着光鲜、容貌端庄、举止得体的白人精英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就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列宁便敏锐地注意到，种族主义是最容易为工人群众接受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话语还极易为帝国主义政府所利用，作为转移人民对政府不满的手段，通过“煽起民族仇恨”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并用文明使命的借口，进行对外战争，不但将本国“人民变成奴隶”，还“派他们去镇压那些不愿做奴隶的别国人民”。

列宁所预见的情况，在同时期的欧洲工业国家、英帝国及其白人殖民地早已普遍出现。排外与种族主义恰恰是工人政党与工会组织抨击执政党、谋求部门利益最常用的政治鼓动工具。同样，即便在今天欧美世界出现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种族主义就像是议会党的隐疾，一旦条件合适，便能够席卷意识形态光谱的左右两端。

汉娜·阿伦特将种族主义视为“国家官僚制度”而非资本主义的恶。而萨米尔·阿明则向我们揭示，**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结果**。然而，透过奴隶与契约劳工的历史，我们看到了种族主义内部对不同人种、不同阶级的精细区分。实际上，作为帝国主义霸权秩序的一部分，种族主义与霸权的世界体系密不可分。它不但保障了帝国主义暴力机器的运转，也创造了能够将世界特定地区、特定人群锁定在压迫链条的底端，确保另一个极少数的群体能够稳定获利的基本结构。

正由于此，种族主义既不是官僚制度的产物，也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结果，它恰恰是资本主义霸权秩序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对种族主义也便成为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利益。从这里出发，纪念死于美国的弗洛伊德，便能与那些几乎被历史遗忘的华工，与20世纪的革命，与第三世界的反抗，与今天谋求独立自主的我们，发生了最深刻的联系。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35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